臺大歷史學報第 64 期
2019 年 12 月，頁 125-204

BIBLID1012-8514(2019)64pp.125-204
2017.10.31收稿，2018.10.12通過刊登
DOI: 10.6253/ntuhistory.201912_(64).0004

晚明人痘法起源及其傳播的再思考

邱　仲　麟 *

提　要

本文討論與人痘接種法起源有關的三個問題。首先，要特別指出的是，「種痘」二字，在明代主要是指得天花、出天花或天花流行，與接種人痘並無關係。清代以後，「種痘」二字才逐漸與接種人痘產生關連，若以清代的詞意套用在明代，顯然犯了望文生義的謬誤。其次，人痘接種法出現時，被稱為「神痘」，意指「神丹種痘」或「神授種痘」。現存史料首次確切記載這種醫術，可以追溯至天啟五年（1625）或六年的湖廣衡州府。天啟六年，神痘法東傳至江西，崇禎年間（1627-1644）傳至安徽及江南等地。清初傳播範圍更廣，大部分仍稱之為神痘法，但其於神話傳說中的起源地四川，在明末清初反而未見記載。其三，明末衡州府有所謂神痘教，崇拜的是金花聖母，正是其陪伴著許多醫生，將神痘法傳往他鄉。在其傳播過程中，金花聖母曾出現在湖北、江西、安徽、浙江及陝西等地。而關於峨眉山神醫傳授神痘法的神話，最早的原型也是金花聖母。歸結來說，「種痘」並非考證上最佳的關鍵詞，而「神痘」與「金花聖母」才是探究人痘接種法起源的終極密碼。

關鍵詞：種痘　神痘　湖南　金花聖母　峨眉山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11529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 2 段 130 號；E-mail: cjlccy@asihp.net.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緒 言
一、起源問題的回顧
二、明清「種痘」字義釋疑
三、神痘法及其後續分化
四、神痘教神話與神道設教
結 語

緒 言

天花，是天花病毒（variola virus）引起的急性傳染病，對嬰兒（甚至是成人）的殺傷力極大。而在 19 世紀牛痘接種法（vaccination）傳入之前，人痘接種法（variolation or inoculation）曾是中國預防天花最重要的一種方式。

但中國的人痘法究竟出現於何時、何地？學界至今尚無定論。多年來，筆者鍥而不捨，未曾放棄追索這一問題。其中，若干學者誤讀明代「種痘」二字，故第二節擬就此再加以釐清。其次，針對神痘法的起源問題，筆者重新檢視蒐集的資料，擬提出萬曆年間起於湖南之新說；並討論神痘法所指為何，及其後續分化的時間序列，附帶反思前此筆者所謂「標準化」（standardization）的問題。[1]其三，查考神痘法由湖廣往外傳播的過程中，金花聖母這一神話如何隨著地域而不斷轉變；另討論神痘法傳播與起壇等儀式的關係。孔子有言：「溫故而知新」，希望此文有助於相關問題之梳理與解答。惟本文在論證的過程中，多次重複引述舊文之史料，敬祈讀者諒之。

1 邱仲麟，〈明清的人痘法——地域流佈、知識傳播與疫苗生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7 本第 3 分（2006 年 9 月，臺北），頁 479-480。

臺灣大學醫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一、起源問題的回顧

關於人痘法的起源，說法莫衷一是。西方世界認為，人痘接種法在東方存在已久。印度神話指出，印度人在耶穌降生前一千多年就開始種痘，種痘師多為婆羅門，固定季節才出診。這種醫術在波斯、喬治亞、亞美尼亞、阿拉伯及其他東方國家廣泛運用；此外，也存在於北非等地，使用的方式皆為劃破皮膚接種。[2]至於中國，Wylie在 1631 年說，中國人早自接近西元紀元時便已接種人痘，歷史達千年或更久。[3] 1863 年，法國駐中國領事戴伯里（Philibert Dabry de Thiersant, 1826-1898）在《中國人的醫學》（*La Médecine chez les Chinois*）有言：據說在西元 2 世紀，中國出現了人痘接種法。[4]

中國使用的人痘法，與印度不同，乃以鼻苗法接種。1700 年 1 月，英國東印度公司職員Joseph Lister從廈門寫給皇家學會會員Martin Lister（1639-1712）的信上，已經簡單談到中國使用痘痂粉末、塞入鼻孔中的人痘接種法。[5]不過，歐洲人廣泛了解到這種方式，係透過耶穌會士殷弘

2 參見 John Zephaniah Holwell, *An Account of Manner of Inoculating in the East Indies* (London: Printed for T. Becket, and P.A. De Hondt, 1767), pp. 7-14. Henry S. Wellcome (foreword), *The History of Inoculation and Vaccination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Disease* (London: Burroughs Wellcome & Co., 1913), pp. 9-18. Arnold Carl Klebs, "The Historic Evolution of Variolation," *The Johns Hopkins Hospital Bulletin* 24, no. 265 (March 1913, Baltimore), pp. 70-71.

3 Wellcome (foreword), *The History of Inoculation and Vaccination*, p. 18. 另一說則說：Wylie 提到中國人在西元 9 世紀以前已經接種人痘，參見 J. C. Thomson, "The Heavenly Flowers,"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1, no. 4 (1887, Shanghai), p.157.

4 J. Dyer Ball, *Things Chinese* (Hong Kong: Kelly & Walsh, 1903), p. 698.

5 Raymond Phineas Stearns and George Pasti Jr., "Remark upon the introduction of Inoculation for Smallpox in England,"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24, no. 2 (1950, Baltimore), p. 107. 並參見 Genevieve Miller, *The Adoption of Inoculation for Smallpox in England and Franc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57), pp. 48-49. C. W. Dixon, *Smallpox* (London: J. & A. Churchill Ltd., 1962), p. 217.

臺灣大學醫學期刊資料庫

緒（Père Francois Xavier d'Entrecolles, 1664-1741）於 1715 年（從饒州）和 1726 年（從北京）寄回歐洲的信上獲悉。[6]有學者據此認為中國的人痘接種法始自 16 世紀。[7] 1754 年，法國皇家科學院會員Charles-Marie de la Condamine（1701-1774）在《人痘接種法的歷史》（*The History, of Inoculation*）也提到：上個世紀初，中國使用一種用鼻子吸入痘痂粉末的接種方式，而非透過切口。[8]

中國人痘接種法的起源時間，隨著乾隆初年吳謙（1689-1748）所編《醫宗金鑑》的刊行，突然往前跳了數百年，西洋人士亦受到影響。乾隆三十三年（1768），耶穌會士韓國英（Pierre-Martial Cibot, 1727-1780）在北京完成其《天花論》（*De la petite vérole*），其後將稿本連同多幅痘童彩畫一起寄回巴黎（參見圖一）。他在論中參考《醫宗金鑑》，並談到中國人痘法起源於 10 世紀末。但他認為，此後種痘法之缺載，不是因為資料失落，而是中國人放棄了這種技術，原因在於所有論述和體制均無法抵禦天花橫行。換言之，由於人痘接種法並未能降低天花肆虐，它被放棄原本就是天命。[9]其後，James Moore（1763-1834）在 1815 年出版的《天花的歷史》（*The History of the Smallpox*）中，先引述殷弘緒始於 16 世紀之說，又提到另一教會論著的意見：10 世紀發明，而其傳統可上溯至更早的宋代，即西元 590 年。[10]其所謂另一教會論著即韓國英的論

6 n/a, "Small-pox Inoculation,"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1847 (1896, London), p. 1264. 按：原文中 1726 年做 1725 年，有誤。

7 Charles F. Forshaw, "The History of Inoculation,"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2592 (September 1910, London), p. 633.

8 Charles-Marie de la Condamine, *The History, of Inoculation* (New Haven: T. and S. Green, 1773), p. 1. 按：此為英譯本。

9 Larissa N. Heinrich, *The Afterlife of Images: Translating the Pathological Bod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5-32. 另參見韓琦，《中國科學技術的西傳及其影響（1582-1793）》（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頁 116-117。

10 James Moore, *The History of the Smallpox* (London: Longman, Hurst, Rees, Orme, and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文，但時代解讀錯誤。1867 年，Thomas Wise（1801-1889）引述韓國英的論著，卻說韓國英指出中國的人痘法起源於西元 2 或 3 世紀；別人的說法是起源於 10 世紀末。[11]該書所述前後倒置，完全誤讀。



圖一　耶穌會士韓國英寄回巴黎的兒童出痘圖

資料來源：現藏法國國家圖書館，右圖取自 http://www.wikigallery.org/wiki/painting_171867/Anonymous-Artist/Child-with-smallpox-%282%29; 左圖取自 https://www.alamy.com/stock-photo-medicine-disease-smallpox-little-girl-with-smallpox-and-a-coral-piece-110821495.html（2018 年 12 月 24 日檢索）。

Brown, Paternoster-Row, 1815), pp. 217-218.

11 Thomas Wise,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2 (London: J. Churchill Ltd., 1867), p. 54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後，西洋人的記載多半採起源於北宋之說。如跟隨馬戛爾尼（George McCartney, 1737-1806）使華的隨員斯當東（George Leonard Staunton, 1737-1801）在來華行記中提到：中國資料首次提及種人痘，據說始自西元 10 世紀。[12] C. T. Downing在書上指出，中國在 10 世紀末發明了人痘法，但因為種痘並不普遍，撲滅天花這一可怕傳染病的目的顯然失敗了。[13]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 1811-1896）考證中國的人痘接種始自宋真宗時（西元 1014 年）。[14]杜德珍（John Dudgeon, 1837-1901）、波乃耶（James Dyer Ball, 1847-1919）、巴德（Emile Bard, 1878-?）也都將起源時間指向宋代。[15]由於印度的神話早於中國，有人認為中國的種痘術來自印度。光緒十年（1884），旅居溫州的傳教士麥嘉湖（John Macgowan, 1836-1922）考證，認為中國最早種痘紀錄在宋仁宗（1023-1063）時。他又在翻譯《痘疹定論》峨眉山女道人為王旦（957-1017）之子種痘的神話結尾之處說：藏僧（Thibetan monk）曾在峨眉山傳授人痘法，而這些藏僧先前在印度學得此一技藝。[16]

清末以來，學界談到人痘法的起源，與乾隆中葉以降的西方學者一樣，最常引述的乃是王旦之子王素（1007-1073）接種神痘之說。[17]光緒

12 George Leonard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vol. 2 (London: W. Bulmer and Co., 1797), p. 535.

13 Charles Toogood Downing, *The Fan-Qui in China, in 1836-7*, vol. 2 (London: Henry Colburn, 1838), pp. 172-173.

14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of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London: Hurst and Blackett, Publishers, 1861), pp. 238-242.

15 參見 John Dudgeon,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Peking for the Half-year ended 31st March 1871," *Customs Gazette* no. 10, part 6 (1871, Shanghai), p. 8. Ball, *Things Chinese*, pp. 698-700. E. H. Parker, "Smallpox and Inoculation in China,"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2402 (1907, London), p. 88.

16 John Macgowan,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Wenchow for the Half-year ended 31st March 1884," *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Medical Reports* 27 (1884, Shanghai), pp. 16-18.

17 參見陳垣，〈牛痘入中國考略〉，《醫藥衛生報》第 7 期（1909，廣州），轉引自《陳垣早年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2），頁 217；周仲衡，〈中國種痘考〉，《中華醫學雜誌》第 4 卷第 1 期（1918，上海），頁 6-8；陳邦賢，《中國

臺灣大學醫學圖書館

末年，甚至有人提到：「唐朝有一位醫家，研究一個防禍未然鼻種的法子。」[18]然而，常州名醫惲鐵樵（1878-1935）則認為：「我國清初時代，曾有人發明種痘之法」，其根據是《張氏醫通》：「邇年有種痘之說，始自江右，達於齊燕，近則徧行南北。詳究其源，云自玄女降乩之方。」[19]他不據《痘疹定論》、《醫宗金鑑》立論，而獨重《張氏醫通》之記載，可見其並不相信神話與託古之說。

面對西人麥嘉湖提出的中國人痘法係自印度傳入之說，國人自己也信心動搖，最有名的例子是王吉民（1889-1972）醫師。民國七年，王吉民撰文提到：人類首次接種感染性病毒是在宋朝（西元 1022 年）；[20]但後來立場有所轉變，他在《中國歷代醫學之發明》一書上說：

> 按醫史家言，種痘之術，昉於東方印度、波斯等國。……或謂中土之種痘術亦自印度傳入，說頗近似。蓋吾國古時，並無痘症，漢馬援征交趾，軍士染痘，流傳國內，始有此病。且四川峨嵋山與印度毗連，兩國交通，率由此途，各國醫術，藉以輸入，固意中事也。[21]

不久，王吉民「由外輸入」的傾向更加明顯，其理由是：從醫史可知，印度、波斯很早就接種人痘，而峨眉山又位處印度邊境，故這種方法極有可能透過商道從印度傳入。[22]

醫學史》（上海：上海醫書局，1919），頁 111a。

18 宋子筠，〈發明天花牛痘的原因並破除謝花的迷信〉，《敝帚千金》第 23 期（1907，天津），頁 7b。

19 惲鐵樵，《上海鐵樵函授中醫學校講義》第 10 種《幼科講義》第 2 期（1911，上海），〈鼻苗〉，頁 1-2。

20 K. Chimin Wong, “Smallpox in China,” *National Medical Journal of China* 4, no. 4 (1918, Shanghai), p. 96. 並見 K. Chimin Wong and Wu Lien-Teh,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 1936), pp. 215-216.

21 王吉民，〈中國歷代醫學之發明（續）·第四章〉，《中華醫學雜誌》第 13 卷第 5 期（1927，上海），頁 331；王吉民，《中國歷代醫學之發明》（上海：新中醫社，1930），頁 37。

22 K. Chimin Wong, “China’s Contribution to the Science of Medicine,”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43, no. 12 (1929, Shanghai), p. 1204. 並見 Wong and Wu,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pp. 274-27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另一個例子是姜振勛。民國十七年（1928），姜振勛在〈種痘叢談〉說：「種痘之術，創自吾國。據世界醫史家言，中國人士，勵行種痘，遠在紀元六世紀以前。然考之吾國古典，僅稱宋真宗時，峨嵋山有神人出為丞相王旦之子種痘而愈，遂傳於世云，時蓋紀元十世紀末也。」但後來在〈三種預防天花之方法〉卻說：「種人痘法發明最早，倡始於西域、印度，遠在千年以上。其流入華夏亦數百年。」[23]祝振綱、咎希昭在《說痘》一書上的說法更為細緻：傳痘法起源地在中央亞細亞地方，一經西方之土耳其而傳入歐洲；一經東方之印度而至中國、日本。[24]爾後，主張中國人痘接種法來自印度的說法依然可見。[25]

另一個說法，是中國、印度彼此各自發展。民國十年（1921），陳汝檢談古代之傳痘法說：「其法太古時於吾國、印度、亞剌比亞已有行之者。或以痂作末吹鼻孔，或以痂與患者食之，或取患者之衣與未患者服之。在印度則於前膊作淺切綫，而接種天然痘漿于其上，冀其先行傳染，幸免於死。」[26]顧學箕的態度更為清楚：一千年前的中國和印度人，利用免疫的道理，用天花病人乾或濕的痘痂，放入未經病者的鼻中，施行人工天花。[27]考慮到印度與中國在接種法上南轅北轍，有學者認為兩國的人痘法應該是各自獨立發展的。[28]晚近，亦有學者將中國與印度並列為可能的起源地，中國在 1567-1572 年間，印度約在 1580 年。[29]另有

23 姜振勛，〈種痘叢談〉，《新醫與社會彙刊》第 1 集（1928，上海），頁 373；〈三種預防天花之方法〉，《新醫與社會彙刊》第 2 集（1934，上海），頁 144。

24 祝振綱、咎希昭，《說痘》（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頁 20。

25 參見Donald R. Hopkins, *Princes and Peasants: Smallpox in Hist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p. 17-18, 109-110, 135-138. 韓德森（D. A. Henderson）著，林基興譯，《天花之死：根除全球殺手的內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1），頁 14。

26 陳汝檢，〈論種痘〉，《博濟月報》第 26 期（1921，廣州），頁 4。

27 顧學箕，〈種痘叢談〉，《民眾醫藥彙刊》第 1 卷（1934，上海），頁 270。

28 F. Fenner et al., *Smallpox and its Eradication*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88), p. 245.

29 Arthur Boylston, “The Origins of Inoculation,” *Journal of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 105 (July 2012, London), pp. 311-3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印度學者指出：證據表明，中國在西元 1000 年左右已經接種人痘，而在印度、土耳其及可能在非洲，時間也差不多。[30]實際上，印度的梵文醫書和《阿育吠陀經》，均無人痘法的相關記載；而印度接種人痘的確切證據，最早僅能上溯至 1731 年。[31]

再者，是中國發明。早在 1867 年，Thomas Wise就認為，中國的人痘法先傳給西域土著，接著伊斯蘭教徒和印度人很快地學會這種方法，並將其引進土耳其，隨後傳往歐洲。[32]民國時期，曾有不少學者強調中國的人痘接種法是自己發明的。[33]楊九徵〈種痘術〉還提到：「清初，俄國遣人來學痘醫。康熙末年，英人亦自土耳其傳其種痘之法于其本國。于是種痘之法，傳播于西歐，一時驚詫神奇。」[34]王祖德〈天花、舊法種痘、牛痘三者之症象與比較〉指出：「舊法種痘，即人工接種天花也。其法創於我國，該法傳入歐洲，大約在十八世紀之初。」[35]李克蕙〈種痘法沿革說略〉說：「嘗考種痘方法，首由我國發明，其後流傳及於日本，歐洲之有種痘法，尤後於我國。」[36]上個世紀，不少西方著作亦指出中國應是人痘法的誕生地。[37]

---

30 Chandrakant Lahariya, “A Brief History of Vaccines & Vaccination in India,” *Indian Journal of Medical Research* 139 (April 2014, Gwalior), p. 492.

31 Jan Val Alphen, and Anthony Aris, eds., *Oriental Medicine: An Illustrated Guide to the Asian Arts of Healing* (London: Serindia Publications, 1995), p. 29.

32 Wise,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2, p. 546.

33 李健頤，〈種痘術是中國最初之發明〉，《衛生報》第 25 期（1928，上海），頁 199；姚靄園，〈種痘的起源〉，《民眾醫藥彙刊》第 2 卷（1935，上海），頁 172；平，〈種痘是中國發明〉，《生路》革新第 9 期（1937，無錫），頁 8-9；陳邦賢，《中國醫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頁 371。

34 楊九徵，〈種痘術〉，《楚寶雜誌》第 1 卷第 1 期（1917，北京），頁 1。

35 王祖德，〈天花、舊法種痘、牛痘三者之症象與比較〉，《天津特別市衛生局月刊》第 1 卷第 3 期（1929，天津），頁 18。

36 李克蕙，〈種痘法沿革說略〉，《國醫砥柱月刊》第 3 期（1937，北平），頁 31。

37 參見 Wellcome (foreword), *The History of Inoculation and Vaccination*, p. 18; Douglas Guthrie, *A History of Medicine* (London: Thomas Nelson And Sons Ltd., 1945), p. 36; Arturo Castiglioni, *A History of Medicin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47), p. 641; Harry Wain, *A*

臺灣大學醫學圖書館

撇開以上諸多糾葛，不少學者持續發掘異於北宋說的記載。如祝振綱、咎希昭在《說痘》提到乾隆年間（1735-1796）旅日醫家李仁山《種痘和解》的記載：「此法神明相傳，云明朝徽州府商人施氏，浮於海上一山，蒙嫘祖天后顯靈，得傳種痘之法。」[38]沙書文〈種痘攷略〉則寫道：「及至明末，有林屋山人，更發明新法，於小兒初生十八日內，以金針在兩臂上微刺出血，遂能終身無痘，即偶有出者，亦輕微無害。」[39]于景枚的〈痘瘡源流〉，除北宋說之外，又提到俞茂鯤（1674-?）《痘科金鏡賦集解》記載種痘起於明朝隆慶年間（1567-1572）寧國府之說。[40]侯甲峯〈友雲樓筆記．種痘〉則摘錄了清初張扶翼《望山堂文集》關於湖南痘被法的內容。[41]另外，章次公（1903-1959）引述《湖州府志》的記載指出：明遺民胡璞是神痘法的創始人，峨眉山神醫創神痘法之說是他假造的。[42]

至 1953 年，范行準（1906-1998）在《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除反對人痘接種法從印度傳入的說法，又提到人痘接種法起源有三個說法，即唐開元年間（713-741）趙氏說、北宋真宗峨眉山神醫說，及清初明朝遺民胡璞說，但三者俱不可信。針對北宋說，他指出江西醫者朱純嘏（1634-1718）說峨眉山神醫為王素種痘，稍具免疫學常識的人就不會相信，因為當時沒有保存痘苗到一個月的方法；而且，「既然說是從北

History of Preventive Medicine (Springfield, Illinois: Charles C. Thomas Publisher, 1970), pp. 173-174.

38 祝振綱、咎希昭，《說痘》，頁 20-21、23。

39 沙書文，〈種痘攷略〉，《中醫世界季刊》第 6 卷第 1 期（1933，上海），頁 46。明末林屋山人創針刺法之說，另見陳世綱，〈種痘新書〉，《現代醫藥雜誌》第 4 卷第 37/38 期（1949，貴陽），頁 3。

40 于景枚，〈痘瘡源流〉，《中華醫學雜誌》第 27 卷第 11 期（1942，上海），頁 697-698。

41 侯甲峯，〈友雲樓筆記．種痘〉，《三六九畫報》第 15 卷第 11 期（1942，北平），頁 19。

42 轉引自范行準，《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上海：華東醫務生活社，1953），頁 113-114。章次公此說，筆者未能查獲來源，竊疑見於氏著《明遺民醫徵略》，此書撰於抗戰期間，書稿後歸范行準收藏，今不知下落。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宋第十世紀後已有種痘術，為何到十六世紀以前沒有人提過種痘術？」另外，康熙以前似無此說，而據章次公所言，種痘神話是胡璞編造，范行準認為，這也僅止於編造，不應將發明種痘的榮譽歸他。相較之下，《痘科金鏡賦集解》的記載：「聞種痘法，起於明朝隆慶年間寧國府太平縣，姓氏失考，得之異人、丹家之傳，由此蔓延天下」，應屬比較正確的紀錄。[43]

范氏主張的隆慶說，並非所有學者都贊同。陳邦賢（1889-1976）就是一個例子。[44]另外，高鏡朗（1892-1983）在《古代兒科疾病新編》提到：「在四川，鼻苗何時開始應用？係誰發明？仍無可稽考。惟此法非從外國傳入，而由中國民間自己發明，此點可以肯定。」又云：「關於鼻痘的歷史，尚有最近章次公根據《湖州府志》所載，鼻苗係明末胡璞所發明。胡氏更捏造峨眉山人與王旦的歷史云。范氏曾表示懷疑。」高氏並提到另一起源說法：「因見痘痂落地，小兒拾玩，就得輕型天花，由此發明鼻苗。近數百年來，浙江紹興幾為江東痘科郎中的發源地，此說盛傳於紹興痘科郎中及中醫界中。但發明何人，在何時代，則亦無從考察。」[45]值得注意的是，高氏完全不提《痘科金鏡賦集解》之說，或許已發現其記載有問題，詳見後述。

不過，贊成范氏者亦不少。1955 年，任應秋（1914-1984）編著之《中國醫學史略》，摘錄范氏的若干論據說：「用接種的方法來控制天

43 范行準，《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頁 112-114。其後，范氏在《中國醫學史略》（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後勤學院，1961）指出：中國人在 16 世紀中葉，即隆慶年間，終於發明人痘接種法。（頁 118）1986 年，范氏於《中國醫學史略（增訂版）》（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86）還是強調：中國免疫思想的重要發展之一，就是在 16 世紀中葉，即明隆慶年間，發明了人痘接種法。（頁 213-214）

44 陳邦賢《中國醫學史》第 3 版沒有改變既有看法，他在談宋代醫學的地方說：「尤有可記的，就是宋真宗時有王旦發明種鼻痘防免天花的傳說，這說明我們的祖先對於預防醫學很早就重視了。」在清代醫學處則寫道：「種人痘的方法，初見於朱純嘏《痘疹定論》中。」參見陳邦賢，《中國醫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頁 190、304。

45 高鏡朗，《古代兒科疾病新編》（上海：上海衛生出版社，1956），頁 118-119。

臺灣大學醫學院圖書館授權

花的發生，是明代最大的貢獻。」[46] 1956 年，盛國榮（1913-2003）支持范行準的論點說：「我也覺得種痘術始於明代比始於宋代是有更加充分可靠的根據。」[47]同一年，中醫研究院中醫教材編輯委員會編輯的《中國醫學史》提到：明代以前醫書無記載種痘方，清初俞茂鯤才說明朝隆慶年間開始種痘。[48] 1958 年，遼寧中醫學院編《中國醫學史講義》指出：我國人痘法究竟發明於何時，文獻記載頗不一致，有說是 11 世紀已發明種痘術，亦有說 8 世紀。以上二說，大多認為不甚可靠，然至明隆慶間，人痘接種法已較為廣泛流行，是肯定的事實。[49]

面對記載之歧異，不少學者採取兼容並蓄的方式。俞慎初（1915-2002）編著的《中國醫學簡史》，先贊同《牛痘新書》所載開元之說，接著說北宋峨眉山有人傳佈種痘術，「這種方法，當時廣泛在民間應用」，但談到明代又說：「十六世紀中葉中國有了種痘術。」[50]北京中醫學院醫史教研組所編《中國醫學史講義》先是指出，據《醫宗金鑑》記載，宋真宗時已經開始應用人痘接種，卻又引述清代俞天池和張琰的記載說：「我國人種痘法的發明最遲在十六世紀或更早一些，則是毫無疑問的。」[51]同一教研組所編《中國醫學史中級講義》談人痘接種法，則說：「這種方法相傳在十一世紀已經有了。據文獻記載，到十六世紀才傳播開來，社會上始有種痘師出現。」[52]

---

46 任應秋編著，《中國醫學史略》（重慶：重慶市中醫進修學校，1955），頁 161。

47 盛國榮，〈我所見到中醫書裏所記載的濾過性病毒的疾病〉，《上海中醫藥什誌》1956 年 5 月號（上海），頁 43。

48 中國中醫研究院中醫教材編輯委員會編輯，《中國醫學史》（北京：中醫研究院中醫教材編輯委員會，1956），頁 89-90。

49 遼寧中醫學院編，《中國醫學史講義》（瀋陽：遼寧中醫學院，1958），頁 87-88。

50 俞慎初，《中國醫學簡史》（福州：福建省中醫藥學術研究委員會，1956），頁 73、97-98。並見俞慎初，《中國醫學簡史》（福州：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1982），頁 141、247-248。

51 北京中醫學院醫史教研組編，《中國醫學史講義》（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0），頁 80-81。

52 北京中醫學院醫史教研組編，《中國醫學史中級講義》（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2），頁 4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70 年代以後，學界逐漸接受范行準《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的考證，如山西中醫研究所教研組編的《中國醫學史略》表示唐開元說與北宋說俱無旁證，而隆慶說則以萬曆、天啟有相關記載為可信，故種痘法之發明，最遲在 16 世紀中葉。[53]《簡明中醫辭典》「天花」條更直接說：明隆慶年間發明了鼻苗法預防天花。[54]傅維康等合著之《醫藥史話》指出：宋真宗時宰相王旦請峨眉山神醫為其子種痘的故事缺乏證據，尚不足以確證我國 11 世紀已發明種痘術。比較可信的是《痘科金鏡賦集解》的記載。[55]此外，尚有許多著作也認為隆慶說較為可信。[56]

1975 年，旅居香港的中醫學家陳存仁（1908-1990）發表〈中國醫學上的偉大發明〉一文，專談鼻苗法，文中列舉《痘疹定論》及浙江嚴州府遂安縣人方象瑛（1632-?）〈種痘小引〉等資料指出：「以上諸說，照表面而論，峨眉山神醫的傳述最甚，但種痘法並非宋時發明，仍是後人託名。」他又說：「種痘法的記載，在清初順治年間還是很少的，到

53 山西中醫研究所教研組編，《中國醫學史略》（太原：山西中醫研究所教研組，1974），頁 125。並見賈得道，《中國醫學史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頁 226-227。

54 中國中醫研究院、廣州中醫學院主編，《簡明中醫辭典》（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79），「天花」，頁 108；朱寶忠，〈人痘接種史話〉，《中西醫結合雜誌》第 2 卷第 4 期（1982，北京），頁 247-248。

55 傅維康等合著，〈人工免疫法的先驅——人痘接種術〉，收入傅維康等著，《醫藥史話》（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2），頁 197。另參見傅維康，《中國醫學史》（上海：上海中醫學院出版社，1990），頁 359。

56 參見哈爾濱醫科大學祖國醫學教研組編，《中國醫學史》（哈爾濱：哈爾濱醫科大學，1974），頁 90-91；上海中醫學院等編寫，《中國醫學史》（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78），頁 48-49；姚元翼主編，《中國醫學史》（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2），頁 85；趙璞珊，《中國古代醫學》（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226；蔡景峰編，《中國醫學史上的世界記錄》（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83），頁 72；陝西中醫學院主編，《中國醫學史》（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頁 105；孔建民，《中國醫學史綱》（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9），頁 185-186；吳少禎、曾令真編，《中國兒科醫學史》（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1990），頁 176-177；廖育群，《歧黃醫道》（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頁 225-226；洪波編著，《中國醫學世界之最》（北京：中國旅游出版社，1991），頁 75-76；王曉鶴主編，《中國醫學史》（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頁 3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了乾隆才多起來，如果北宋年間為了宰相王旦之子而此法流傳於世，不應該在北宋到明末的六百年之間，經歷了金元明三朝都不提起此項偉大的發明！況且有金元四大家和明朝許多名醫的醫書，決不會隻字不提。所以我相信種痘術的發明，應該在明末之時，很少可能在北宋開始的。」[57]比較奇怪的是，他和高鏡朗一樣，始終未談《痘科金鏡賦集解》的記載，不知何故？

在臺灣學界，北宋說的影響未減，如劉伯驥之《中國醫學史》論宋代醫學發展有云：「古之醫痘者，惟待其毒之既發而治之，種痘用痘苗絮於鼻孔一法，原始於真宗時代。峨眉山有神人，為宰相王旦之子種痘而愈，其法遂傳於世，此為世界種痘之最早者。」[58]鄭曼青（1902-1975）、林品石之《中國醫藥學史》的觀點類似。[59]比較不同的是史仲序的《中國醫學史》，書中引述《痘疹定論》宋仁宗峨嵋山人之說，云從此國人才知道為小兒接種人痘，預防天花，亦為中國醫學史開一新紀元；又據清代俞天池《痘科金鏡賦集解》和張琰《種痘新書》的記載，認為我國人痘接種法的發明，最遲在 16 世紀以前。[60]

迄至 1990 年，仍有學者持北宋說，如李經緯（1939-2013）、李志東合著之《中國古代醫學史略》認為，一般學者基於論據充分，有旁證資料，大多贊成始於 16 世紀一說；不過始於宋代、甚至唐代的說法，也並非完全出自臆造。[61]王樹岐、李經緯、鄭金生合著之《古老的中國醫學》亦相信北宋已經出現人痘接種術，並表示有學者認為 16 世紀才發明，這是就該術普遍推廣而言，出現時間是被推遲了。[62] 2000 年出版、

57 陳存仁，〈中國醫學上的偉大發明〉，《大成》第 14 期（1975，香港），頁 2-3。

58 劉伯驥，《中國醫學史》（臺北：華岡出版部，1974），頁 284。

59 鄭曼青、林品石，《中國醫藥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頁 171-172。

60 史仲序，《中國醫學史》（臺北：國立編譯館，1984），頁 136。該看法明顯受到 1960 年《中國醫學史講義》的影響。

61 李經緯、李志東，《中國古代醫學史略》（石家莊：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頁 247。

62 王樹岐、李經緯、鄭金生合著，《古老的中國醫學——中國醫學編年史研究》（臺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李經緯、林昭庚主編的《中國醫學通史．古代卷》說：唐代發明人痘接種並非完全不可能；始於北宋，亦不能認為全無憑信。[63]直至 2015 年，李經緯在《中醫史》修訂版中仍然堅持舊說：始於宋代，甚至唐代的說法，並非完全出自臆造。[64]

實際上，《痘科金鏡賦集解》的記載也有問題。民國七十六年（1987），梁其姿撰文指出：雍正初刻本《痘科金鏡賦集解》並無種痘的記載，至光緒二年（1876）重刊本才出現接種人痘的內容，並非俞氏原撰；[65]因此，隆慶年間起源於寧國府太平縣之說不能成立。可惜的是，這一重大發現並未引起學界太多關注。正因為她不相信隆慶說，故猜測「崇禎時代的胡璞是人痘種法的創始人」。[66]不過，余新忠認為胡璞應該只是最早在湖州種痘，而非發明者。[67]

二、明清「種痘」字義釋疑

1953 年，即半個多世紀前，范行準在其《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一書中，曾列舉晚明若干材料，證明萬曆年間（1573-1620）人痘接種已漸風行。如周暉《瑣事剩錄》記載：「陳評事生一子，頗鍾愛。……其受用過分，未幾種荳夭。」他認為「種荳」當是「種痘」最初的名稱。此外，又引程從周《程氏醫案》所載：「一兒布痘，痂中生蛆」一案，認

緯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0），頁 296-297。

63 李經緯、林昭庚主編，《中國醫學通史．古代卷》（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0），頁 492-493。

64 李經緯，《中醫史（修訂本）》（海口：海南出版社，2015），頁 284-285。

65 梁其姿，〈明清預防天花措施之演變〉，收入陶希聖先生九秩榮慶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國史釋論：陶希聖先生九秩榮慶祝壽論文集》（臺北：食貨出版社，1987），上冊，頁 239，註 29。

66 梁其姿，〈明清預防天花措施之演變〉，頁 241。

67 余新忠，〈清代江南種痘事業探論〉，《清史研究》2003 年第 2 期（北京），頁 29-30。

臺灣大學醫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為此亦萬曆中已有種痘之文獻。[68]其後，梁其姿在〈明清預防天花措施之演變〉一文中，亦引述明末喻昌（1585-1664）《寓意草》記載顧諶明二子「種痘」而亡，及萬曆年間李樂（1499-1558）《見聞雜記》兩則關於「中痘」的記事，論證晚明接種人痘的蛛絲馬跡。[69]

如前所言，雖然隆慶說存在史料學上的瑕疵，但學者普遍認為人痘接種法出現於明代。更由於「種痘」二字在明代文獻經常出現，故學者多半認定這就是指接種人痘。如李約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曾引萬全（1499-1582）《痘疹世醫心法》記「女子種痘，經水忽行，暴喑不能言語」這條證據，認為嘉靖年間（1522-1566）已經有接種人痘導致月經不調的紀錄。[70] 2004 年，姜生發表〈道教與種痘術〉一文，依據鄭善夫（1485-1523）〈與應南洲〉信上所述：「春間得越中二手教，繼得顯仁濟上種痘事」這段話，認定中國種痘法最晚在嘉靖元年（1522）已經存在。[71]針對姜生這一說法，筆者在〈明清的人痘法〉一文指出此記載太過簡略，所言未必即為接種人痘。[72]其後，姜生將關於人痘法起源的部分摘出，刊登於 2008 年初的《自然科學史研究》。[73]然筆者深覺

68 范行準，《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頁 114。

69 梁其姿，〈明清預防天花措施之演變〉，頁 244。

70 Joseph Needham, *China and the Origins of Immunology* (Hong Kong: Center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0), p. 15. 李約瑟講，馬伯英、林群譯，〈中國與免疫學的起源（續）〉，《中醫藥學報》1983 年第 5 期（哈爾濱），頁 8-9。並見李約瑟講，陳養正譯，〈中國與免疫學的起源〉，收入潘吉星主編，《李約瑟文集》（瀋陽：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1986），頁 1028；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6, *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 part 6: *Medic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34.

71 姜生，〈道教與種痘術〉，「『宗教與醫療』學術研討會暨亞洲醫學史學會第二次年會」論文（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2004 年 11 月 16-19 日）。

72 邱仲麟，〈明清的人痘法〉，頁 464。

73 姜生，〈1522 年中國種痘的最早記載及傳說考論〉，《自然科學史研究》第 27 卷第 1 期（2008，北京），頁 125。並見姜生，〈道教與種痘術〉，收入林富士主編，《宗教與醫療》（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頁 228。晚近，苗潤博又考證鄭善夫寫〈與應南洲〉這封信是在嘉靖二年（1523），故現存有關種痘最早的記載，應該修訂為西元

臺灣大學醫學院圖書館

該說有待商榷，不久即著手撰寫此文。惟在撰寫過程中，因涉及痘神信仰問題，故將心力投注於後者之處理，[74]以致此文遲遲未能脫稿。可喜的是，張一鳴與筆者的看法相同，已指出明代「種痘」二字未必指接種人痘。[75]針對以上詞語，筆者擬稍加辨析。

（一）明代「種痘」的意涵

歷史研究首重證據，而於引證最忌望文生義。由於清代文獻多半稱人痘接種為「種痘」，故學者每每誤以為明代亦然，以致在論證上產生錯誤。實則「種痘」二字，在明代文獻中主要係指出痘、發痘或痘疫而言，與接種人痘並無干係。如元末明初成書的道教典籍《道法會元》就有「行麻種痘神君」一神，其職責與散播麻疹和天花有關。[76]

明代中醫典籍所言「種痘」，也都指出痘，如嘉靖四十四年（1565）成書之《本草蒙筌》提到，荔枝殼以火燒後，有解穢的功能，「種痘宜求」，[77]也就是說，出痘時應該燒荔枝殼解穢。而李約瑟所引萬全《痘疹世醫心法》記載「女子種痘，經水忽行，暴喑不能言語」，[78]其內容所指，係女子出痘，又遇上月經，以致衍生其他疾病，「種痘」並非接

1523 年。參見苗潤博，〈起源時間與傳說流變：種痘術早期發展史二題〉，《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 17 卷下（2016，天津），頁 163-165。

74 邱仲麟，〈明清的痘疫與痘神廟〉，「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m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in Urban China from the Ming to the Republic 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北京：法國遠東學院與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合辦，2009 年 10 月 29-31 日）；邱仲麟，〈明代以降的痘神廟與痘神信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88 本第 4 分（2017 年 12 月，臺北），頁 785-915。

75 張一鳴，〈人痘接種法的文獻研究〉（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碩士論文，2016），頁 29-30。筆者不察，未注意到該碩士論文，感謝審查人告知。

76 白雲觀長春真人編纂，正統《道藏》（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據明正統十年〔1445〕刻本影印），第 51 冊，《道法會元》，卷 220，〈神霄遣瘟送船儀〉，頁 187。

77 陳嘉謨，《本草蒙筌》（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卷 5，〈菓部．荔枝肉〉，頁 456。

78 萬全，《痘疹世醫心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據明萬曆十一年〔1583〕陳允升刻本影印），卷 10，〈婦人瘡疹證治歌括〉，頁 332。

臺灣大學醫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種人痘。另外，萬全《痘疹格致要論》談到世上有人不出痘，應該是當事者「受天地之清氣，稟父母之清氣，氣清質粹，無有穢毒，當天令種痘之年，亦曾發熱，只出一兩點而不覺也，豈真終身不出乎？」[79]其中所謂「天令種痘之年」，指的即為痘疫之年。



圖二　日本醫家神田玄泉《痘疹精要》（1720）的
蛇皮痘與血疱痘圖

資料來源：https://www.tumblr.com/search/kanda%20gensen（2018 年 3 月 1 日檢索）。

明人稱出痘為「種痘」的例子，詩文中更俯拾皆是。除鄭善夫〈與應南洲〉的例子之外，又如嘉靖八年（1529）邵經邦（?-1558）之〈弘齋雜咏十首〉，其中一首云：「男生雖暮可提攜，日夜惟貪種痘稀。豈料一番齊痂疕，漫勞十起倒裳衣。幸無瘼痎全瘳疾，從此馳驅可奮飛。今曉高齋始安坐，笑看結束乳梅肥。」[80]詩中所述乃是希望兒子出痘時

79 萬全，《痘疹格致要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嘉靖間羅田萬氏原刊本），卷 8，〈或問〉，頁 10b。

80 邵經邦，《弘藝錄》（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 據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邵遠平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痘粒稀少，但事與願違，雖然費一番周章，但還是安然渡過難關，大家才放下焦慮。而在嘉靖三十年（1551），邵經濟（1493-1558）致其亡妻的祭文亦提及：「汝孫近日種痘，亦荷保全，固知汝之靈訶護所及」，[81]說的是孫子出痘，賴她在天之靈庇佑，故得以安然無事。

天花是嬰兒的殺手，家長通常極為緊張，甚至有家長為照顧患者而亡。隆慶五年（1571），山東兗州府東阿縣監生賀謀甲（1528-1571）任御史時，請假返家，「值二子種痘，身懷抱之，不寢食者兩月，因而大病，卒矣」。[82]謀甲為照顧二子出痘，辛苦兩個月而累死。如果是接種人痘，應該不至於如此。又有朱國楨（1558-1632）原本想藉由表弟上京，隨信贈上扇面給貴州道御史傅某，「適小孫種痘者三人，勢頗棘，心中皇皇」，無暇書寫，故未能送去。[83]另外，熊鼎華（1625-1644）「三歲種痘，夜啼而驚，初不知其症」，由於鄉下缺乏醫生，家人找一老儒醫治，老儒誤以為驚風，推拿過度，因此傷及手和一腳。[84]

其實，不僅嬰兒遭遇厄運，成年者因痘而亡也不乏其例。萬曆十五年（1587），查一陽（1572-1588）年十六，原定次年二月十二日舉行婚禮，除夕當天「忽感種痘，初出時密如蠶種，醫者以為難治」，至正月十四日病故。[85]崇禎十一年（1638），冒襄（1611-1693）在〈夢記〉也談到「次子又種危痘」，及「同堂有嬸年十七，忽于元日亦種痘，恰至

本影印），卷 13，〈弘齋雜咏十首〉，頁 394。

81 邵經濟，《西浙泉厓邵先生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據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張景賢王詢等刻本影印），卷 6，〈小祥祭文〉，頁 527。

82 于慎行，《穀城山館文集》（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 據明萬曆于緯刻本影印），卷 26，〈明故太學生杏野先生賀公墓表〉，頁 47。

83 朱國楨，《朱文肅公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據清抄本影印），〈送貴州道傅〉，頁 230-231。

84 熊文舉，《雪堂先生文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據清初刻本影印），卷 22，〈亡兒鼎華殉義志〉，頁 522。

85 查鐸，《毅齋查先生闡道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據清光緒十六年〔1890〕涇川查氏濟陽家塾刻本影印），卷 9，〈亡孫一陽墓碑〉，頁 565。

臺灣大學醫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上元日卒」。[86]這兩段文字牽涉到的是出痘，並非接種人痘。

另外，范允臨（1558-1641）之妻徐媛在〈悼冢孫文〉中提及，萬曆三十一年（1603），浙江嘉興「種痘者眾，十不全三、四」，[87]顯然是大規模的痘疫流行。而內地與沿海地區相比，貴州天花傳染一向較少，當地土著甚至認為漢人有天生痘毒，會傳染給他們。萬曆末年，何喬遠（1558-1631）有一段饒富趣味的記載：

> 曩時張總兵嘗為予言：黔貴中諸夷，其人多不種痘，買得漢婦女，用為繡女，率不敢近，曰漢人嘗痘，恐其生子或痘。……吾中土人最慎痘症，兒子種痘，抱持密室中，不敢風者四十餘日，不敢暈（葷）食者亦四十餘日。[88]

這段話比較漢人與貴州土著對天花的態度，談到貴州土著感染痘疹者甚少，買漢族女子做繡娘，也因怕被傳染而不敢冒犯；漢人則對小孩出痘甚為保護，安置在密室中四十餘日，不敢讓其受風，家人也不敢葷食。

小兒出痘，常與神靈世界有所牽扯。如寧國府推官許光祚深得民心，萬曆四十二年（1614），蒞任一月生下一男，至「七、八月種痘」，百姓為此前往各廟宇下修蘸祝禱。[89]萬曆四十七年（1619），茅元儀（1594-1640）給友人的信中亦提到：「弟當六歲種痘時，以稱讚大士名號不已，目擊降臨。」[90]這兩則記載所謂的「種痘」都是指出痘。而據

86 冒襄，《巢民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據清康熙刻本影印），卷 4，〈夢記〉，頁 598。

87 徐媛，《絡緯吟》（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據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范氏刊本影印），卷 11，〈悼冢孫文〉，頁 406。

88 何喬遠，《何氏萬曆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據明萬曆四十年〔1612〕刻本影印），卷 17，〈張士興《痘症百問歌》序〉，頁 377。

89 湯賓尹，《睡庵稿・詩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據明萬曆刻本影印），卷 10，〈奉賀許理公公子彌周詩有序〉，頁 506。查閱《寧國府志》，晚明寧國府推官僅許光祚姓許，其任期為萬曆四十二年至四十四年（1614-1616）。參見莊泰弘等纂修，康熙《寧國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 據清康熙十二年〔1673〕重修刊本影印），卷 9，〈職官上・明〉，頁 661。故許光祚小兒出痘，發生在萬曆四十二年。

90 茅元儀，《石民四十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據明崇禎刻本影印），卷 79，〈與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虞書》記載：明末常熟生員許彥雲兒子「種痘」，與唐市小城隍廟的神明約定：「男若愈，當起大殿，世奉香火。不然，焚爾像、毀爾廟。」過三日，男孩病死。許某拿著斧頭，對準神額，一劈兩開，丟入火中，並將廟拆掉。[91]

至於喻昌《寓意草》所載顧諟明醫案中的「種痘」，若細讀內容，可以發現亦是出痘，而非接種人痘。顧諟明係南直隸太平府當塗縣人，晚明曾在福建福州府閩縣擔任典史，[92]這時在北京當小官，但不知是何職位。其子出痘時，正與順天府同知在朝陽門賑濟災民。由於太醫（即天門下醫者）已經說樣痘是「狀元痘」，故諟明認定不用服藥，即使喻昌一再勸說，而且開了藥方，還是不轉念，最後二子均因此而亡。[93]其中提到的「狀元痘」，乃是明清痘醫看痘文化的一種說法。浙江醫家費啟泰（1590-1675）就說：天啟四年（1624），「曾有一痘磊落粗綻，肥紅光澤，圓滿如珠，目之者咸贊其為狀元痘」。[94]進入清代，狀元痘之說仍然存在，如康熙三十二年（1693），曾王孫（1624-1699）〈示郊孫〉信中談到：「前采臣字來，云汝見痘樣，醫者稱為狀元痘子。」[95]江蘇淮陰醫家吳瑭（1758-1863）亦提到：「相傳痘瘡稀少，不過數十粒，或百餘粒，根顆圓綻者，以為狀元痘，可不服藥。」[96]

鄒子尹書〉，頁 648。

91 劉本沛，《虞書》（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 據民國二十一年〔1932〕鉛印本影印），頁 559。

92 郝玉麟、謝道承等修纂，雍正《福建通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22，〈職官三・福州府・閩縣〉，頁 126。

93 喻昌著，蔣力生點校，《寓意草》（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卷 4，〈直敘顧諟明二郎三郎佈痘為實小所誤〉，頁 475-476。

94 費啓泰，《救偏瑣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據清嘉慶元年〔1796〕金閶惟善堂印本影印），卷 10，〈論大黃〉，頁 737。

95 曾王孫，《清風堂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據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曾安世刻本影印），卷 12，〈示郊孫〉，頁 178。

96 吳瑭，《問心堂溫病條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據清嘉慶十八年〔1813〕問心堂刻本影印），卷 6，〈解兒難・痘瘡稀少不可恃論〉，頁 770。

臺灣人文醫學期刊資料庫

揆諸以上案例，明代文字所云「種痘」，並未指涉人痘接種。直至清初，士人所書「種痘」，仍多指「出痘」或「患痘」。如順治十七年（1660），毛聚奎〈楊媼方孺人哀誄〉記載：楊公采的元配孺人方氏（?-1660）僅生育長子，而其妾戴氏雖生三子，卻都是方氏抱哺養育；「種痘必孺人（方氏）寢處俱」，戴氏僅在外準備粥糜而已。[97]又如陳鼎（1650-?）《滇黔土司婚禮記》記載：「苗中嬰兒最忌種痘，痘必死，百無一二生者。其氣又易染，即壯夫染之，無不痘，痘無不死。常因一兒痘，而禍延一鄉，竟絕噍類者。」[98]這與晚明何喬遠的說法類似，可見雲貴土著對天花的畏懼直至清初未減。

而出痘之所以被稱為「種痘」，乃是其有如豆子，正如浙江台州府臨海縣人洪若皐（1624-1695）所說的：「痘疫謂之種痘，譬如種荳然，溫即出，寒即不出，理勢然也。」[99]洪氏對此的描述，與前此所謂的「布痘」亦可互證。

（二）神丹種痘與神痘法

必須強調的是，人痘接種法出現及其傳播之初，主要被稱為「神丹種痘」或「神痘」。

正如梁其姿所指出，種痘法起於隆慶年間寧國府之說出現於晚清。而在晚清之前，從未有文獻提到寧國府是種痘法誕生之地，反而是江西頻頻見於記載。職是之故，先前筆者誤以為人痘接種法應起源於江西。[100]不過，隨著新事證的發掘與重新思考，筆者認為江西亦未必是人痘法的起源地，而湖南可能在接種人痘的時間上更早於江西。之所以做此推測，

97 毛聚奎，《吞月子集》（臺北：中國文化研究所，1964 據民國二十三年〔1934〕四明張氏約園刊本影印），卷 2，〈楊媼方孺人哀誄〉，頁 52b。

98 陳鼎，《滇黔土司婚禮記》（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據《知不足齋叢書》本排印），頁 8。

99 洪若皐，《南沙文集》（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 據清康熙刻本影印），卷 5，〈庸醫傳〉，頁 242。

100 邱仲麟，〈明清的人痘法〉，頁 462-46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係因另有其他證據可為輔助，即明末湖南有所謂的「神痘教」。事據康熙十九年（1680）《瀏陽縣志》記載：

> 瀏地生男女者，每以痘疹為深憂。明天啟眚，司寇胡公家聞衡州有神痘教，所奉祀之神曰「金花天母」，人惟一誠所感，無不吉祐，第一切淫污媟褻之事須屏絕於念慮，斯神之格也如響應聲。胡宦即從彼地傳種，後果靈驗，遂建好生祠祀之，宏麗殊甚。禎朝之季，苦遭兵燬。司寇季子瑜艱於嗣息，及生子其濚，甫三週，仍乞神種，果邀福庇。今復於北城外建祠，命僧家奉祀，蓋亦取同慈悲度人之意乎！[101]

《古今圖書集成》將此條載入《職方典》中，但字句略有刪節。[102]《瀏陽縣志》提到的「司寇胡公」，即縣人胡應台（?-1644）。天啟四年（1624）二月，胡應台由總督兩廣兵部右侍郎陞任南京刑部尚書；天啟五年七月，因御史莊謙彈奏其為「邪黨」而被革任回籍。[103]從引文「胡宦即從彼地傳種」看來，當時胡應台應該已回家鄉，因此神痘法傳入時間應在天啟五年秋天以後。先前，由於學者多半認定人痘法起於隆慶年間的寧國府，對於這條資料並未給予太多關注。從史料學的角度看，這條記載無疑是人痘法起源極關鍵的一條史料，將確切可論證的時間落在天啟年間（1621-1627）。而且，特定技術的發展需要試驗與醞釀，此一技術應非

101 曹鼎新、龍升修纂，康熙《瀏陽縣志》（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九年〔1680〕刊本微捲），卷 14，〈拾遺志〉，頁 5b-6a。

102 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臺北：鼎文書局，1976），卷 1210，〈長沙府部彙考十・長沙府祠廟考一・瀏陽縣〉，頁 15。修改後之內容為：「瀏地生男女者，每以痘疹為憂。明天啟時，司寇胡公家聞衡州有神痘教，所奉祀之神曰『金花天母』，人惟一誠格之，無不吉祐。胡宦即從彼地傳種，後果靈驗，遂建好生祠祀之，後苦遭兵毀。司寇季子瑜艱於嗣息，及生子其濚，甫三週，仍乞神種，果邀福庇。今復於北城外建祠祀焉。」學界最早引述《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這條記載者為王嘉斌，參見王嘉斌，〈清代天花防治研究〉（臺北：東吳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頁 19。可惜其在論文並未展開論述。

103 溫體仁等撰，《明熹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 39（梁本），「天啟四年二月癸卯」條，頁 2270；卷 61，「天啟五年七月戊申」條，頁 2867。

臺灣大學醫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天啟年間才開始發展，出現時間可能更早。由此推測，萬曆末年衡州府境內可能已存在神痘法，而在天啟末年才傳至長沙府瀏陽縣。

長沙府上階層士大夫引種神痘之舉，具有某程度的示範意義，在社會上應當帶來效應，從而在附近傳播開來。不久，江西也出現相關記載，據康熙《湖口縣志》記載：天啟六年（1626），「初種順痘，即今神痘」。[104]江西出現這種醫術係在傳到瀏陽之後的第二年，瀏陽距離洞庭湖不遠，且由洞庭湖口經長江東傳至鄱陽湖口極為容易。要之，江西的神痘法應是受到湖廣的影響，而非當地自行發展。而在崇禎（1628-1644）初年，南昌府奉新縣人「有自西蜀傳神痘之法來者」，[105]此傳播路徑由西邊來，間接證明江西神痘法來自湖廣的可能性。崇禎年間，吉安府永寧縣則出現種疹法。[106]廣信府弋陽縣則稱之為神疹法。據康熙十一年（1672）所修《弋陽縣志》記載：

> 黃旻曙，五十三都人；徐成吉，五十五都人，得十全之稽，曰「神疹法」，以棉絮取痘漿之佳者，傳入鼻內，及愈，有瘢如真，往往靈驗，遠近皆聞其風焉。[107]

而此與吉安府永寧縣在用字上極為接近，即「種疹」與「神疹」。按，黃、徐二人被《弋陽縣志》列入〈藝術傳．國朝〉，應生於晚明而逝於順治或至康熙初年，其「神疹法」可能是在崇禎年間學得。康熙末年，《古今圖書集成》收錄此傳，將其列入明朝，文字稍有修改：「黃旻曙，

104 范之煥、陳啓禧等修纂，康熙《湖口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 據清康熙十二年〔1673〕刊本影印），卷 8，〈外志．祥異〉，頁 731。

105 黃虞再、閔鈺修纂，順治《奉新縣志》（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元年〔1662〕刻本），卷 14，〈雜志．寺觀〉，頁 2a。

106 鄭仲夔，《冷賞》（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 據清道光蔡氏棠梨華館重雕本影印），卷 3，〈永寧種疹〉，頁 9a。

107 陶耀修纂，康熙《弋陽縣志》（杭州：華寶齋書社，2001），卷 8，〈人物志．藝術．國朝〉，頁 287b。康熙二十二年刻本亦同，見譚瑄等修纂，康熙《弋陽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 據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刊本影印），卷 8，〈藝術．國朝〉，頁 62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五十三都人；徐成吉，五十五都人，得十全之神痘法，以棉絮取痘漿之佳者，送入鼻內，及愈，有瘢如真，往往靈驗，遠近皆聞其風焉。」[108]

崇禎年間，南直隸寧國府也出現這一技法。據地方志記載：寧國府旌德縣醫者江希舜（1585-1668），著有《痘症鉉珠》等醫書，「首創種痘良方，概不計利」。[109]至於其何時獲得此一技術，筆者認為可能是在崇禎年間。而大約在崇禎末年，寧國府涇縣醫者吳鼎臣已在江南為人接種神痘。康熙十三年（1674），金壇士人曹煜向揚州府江都縣士人常典推薦神痘法，信中提到：

> 敝同年吳再甫之弟鼎臣兄，……能以神丹種痘，婁江奉為神師，三十年于婁，保嬰千二百餘人，真神師也。[110]

按曹煜與寧國府涇縣人吳維駿（即吳再甫），皆為順治十四年（1657）舉人，吳鼎臣則為吳維駿之弟，擅長神痘法，移寓蘇州府太倉州三十年，接種一千二百餘人。由康熙十三年往前推三十年，約在崇禎十七年（1644）定居，而他學會神痘法當更早於此。另外，徽州府歙縣醫家李志康（1696-1753），專精於醫治痘疹，「能以神術放之，歲常集百室之童男女，視其形相神色，可使必無虞者，以痘苗引之，計日而見影、而起漿、而落痂，百不失一」。[111]清代徽州人稱種痘為神痘，稱種痘醫生為「放神痘先生」，婺源縣慶源村生員詹元相的《畏齋日記》就有「放神痘張穆仙先生至」、「謝神痘先生廬源詹漢麟宗兄」等內容。婺源日

108 陳夢雷編，李鴻濤等標點，《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8-1991），卷 516，〈醫術名流列傳・明七・黃旻曙、徐成吉〉，頁 416。范行準《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所引內容，即出自《古今圖書集成》。

109 湯學良，〈江希舜簡考〉，《中華醫史雜誌》第 17 卷第 2 期（1987，北京），頁 90；李瑾、葉長揚等修纂，乾隆《旌德縣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據清乾隆十九年〔1754〕刻本影印），卷 8，〈人物・藝術〉，頁 181。

110 曹煜，《繡虎軒尺牘》（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據清康熙傳萬堂刻本影印），卷 2，〈寄常敘五〉，頁 31。

111 江永，〈西源肇燕李先生傳〉，收入李向榮等修纂，《三田李氏重修宗譜》（北京：線裝書局，2002 據清乾隆間刻本影印），卷 41，頁 39a-b。

臺灣人文與醫療期刊資料庫

用類書《目錄十六條》中，也有休寧程易兼所撰〈神痘說奉贈某字某姓先生〉一文。[112]

江蘇方面，則因曹煜不斷寫信推薦神痘法而留下難得的史料。除前面所引者外，康熙十三年，曹煜〈寄王怡白〉書亦提到：「鼎臣能以一粒靈苗，置小兒鼻中，十日而痘。往來于婁三十年，所生活小兒千二百餘，婁人尊為神師，真神師也。」[113]不過，吳鼎臣還是有失手的時候。康熙十七年（1678），太倉人王抃（1628-1692）因友人盛敬勸其為齊兒種痘，他以吳鼎臣醫術頗高，且種者百無一失，於是選擇吉日下苗，豈料齊兒竟至不治。雖然其妾歸咎吳鼎臣，他則認為是命。盛敬也感到過意不去，來信道歉，王抃回信請他不必介意。[114]

種痘法傳入浙江，也被稱之為「神痘」。康熙五年（1666），江西豐城老醫者王某至嚴州府遂安縣，以吹鼻法治天花。百姓對這一新的治療方式有疑慮，前往請教方象瑛，象瑛於是撰〈神痘說〉以解惑。首先，說明神痘法的醫理：「神痘施於無病之先，調於將病之日，寧有失乎？今人患痘幸痊，相與襲其衣，分啜其糜粥，皆得傳染無恙，亦猶是也。」由此看來，痘衣法先前已經傳入，但它並不屬於神痘法。其次，解釋何以叫神痘。第三，確定神痘不是治病，而是預防，所以不需用藥。第四，強調神痘法的功效卓著，接種後不會再出。[115]透過以上述論，方象瑛回答民眾四個疑問。後來，此文被收入康熙四十七年（1708）刊刻的《憑山閣增輯留青新集》中，篇名改為〈種痘小引〉。有學者認為，方象瑛

112 王振忠，〈徽州文書所見種痘及相關習俗〉，《民俗研究》2000 年第 1 期（濟南），頁 41、43-44；王振忠，〈清代前期徽州民間的日常生活——以婺源日用類書《目錄十六條》為例〉，收入陳鋒主編，《明清以來長江流域社會發展史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頁 683。

113 曹煜，《繡虎軒尺牘》，卷 2，〈寄王怡白〉，頁 31。

114 王抃，《王巢松年譜》（上海：上海書店，1994 據吳中文獻小叢書影印），康熙戊午條，頁 44。

115 方象瑛，《健松齋集》（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 據清康熙世美堂刻康熙四十年〔1701〕續刻本影印），卷 16，〈神痘說〉，頁 259。

臺灣大學醫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的〈種痘小引〉可能是「世界上最早推廣預防接種術的實地報告」。[116]

另外，浙江醫者曾到江西學習，如紹興府會稽縣醫者史錫節云：「愚謂神痘之說似屬荒唐，殊不知內中實有至理。蓋此第就其胎毒，引其胎毒出外，並不使一毫時氣乘于其間，所以必獲保全。」他常向賢師益友訪查神痘之說，頗得其術。康熙十二年（1673），「曾與一譚友種痘于章水豐城間，全活百餘人，並無一殤者」，[117]可見史錫節曾到南昌府豐城縣學習神痘法，並放苗施種。

明清之際，神痘法漸漸流行，但有些兒科醫生對此技法持反對立場，如武昌府江夏縣醫者程雲鵬（1585-1670?）在《慈幼新書》中提到：

> 世有神痘家，其術在能定嬰兒稟賦，出痘不死，然後種之，百無一失。間有壞事者，偏屬富貴之子，蓋非不能灼見，未免貪利心切，即不可種，而意圖徼倖，遂至失手。此醫之過，抑富貴者自取。果能聽造化主持，出痘雖重，高明猶可著手，乃必勉強矯揉其正氣，使之根本脫離而不可救，不亦可哀也夫！[118]

按《慈幼新書》實與《慈幼筏》同書而異名。由引文中可知，程雲鵬對神痘法語帶保留，而此一態度即李驎（1634-1710）〈《慈幼筏》序〉所云：「至於神丹種痘，矯揉戕賊，兢兢致戒。」[119]當時，神痘法最流行的地方是湖廣與江西。如前引《種痘仙方》說：「邇年有種痘之說，始自楚中江右，達於燕齊，近則遍行南北。」康熙初年，方象瑛亦言：「江楚間多種神痘」，[120]所指即江西與湖廣。而前引曹煜給任國錡的信上，也談到「種痘之法，向惟楚豫間有之」，指的是湖廣、豫章（江西）一

116 鐘錂、姚麗群、耿海生，〈《種痘小引》對人痘接種術的記述〉，《中華醫史雜誌》第 39 卷第 3 期（2009 年 5 月，北京），頁 135。

117 史錫節，《痘書大全》（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尺木堂刻本），卷上，〈原痘論〉，頁 3a。

118 程雲鵬，《慈幼新書》（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89），卷 3，〈痘瘡・總訣〉，頁 16。

119 李驎，《虬峯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據清康熙刻本影印），卷 15，〈《慈幼筏》序〉，頁 435。

120 方象瑛，《健松齋集》，卷 16，〈神痘說〉，頁 25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帶。兩者所言，基本上是一致的。另外，康熙年間，嘉興府平湖縣人陸琰卓在《東邨隨筆》記載種痘云：

> 其法即以所種出之痘為苗，天行時不用懼性氣太烈也。下苗視兒強弱為多寡，強者一分，弱者半分，綿絮裹之，稍含濕，男左女右，塞鼻孔。七日便發熱見樣，名報痘。六日，母痘熱少者，起發少，熱甚者受毒必深，起發亦多，但不至如自出者之不可救耳。其百人之中，或仍有一失者，則本來脾弱，或更受邪冒風所致。大抵此法，皆從脾經發根，故健脾忌風，尤為緊要。四時冬春更佳，易於調護，若精力薄者，五、六日即發。新安富室大家多用之，而江右尤盛。[121]

這段內容除描述接種人痘的細節外，並語及死亡率與種痘最佳季節，尤其重要的是提到徽州富貴家多種痘，而在江西尤其盛行。歸結而言，神痘法雖起於湖廣，但江西在傳播上卻具有樞紐地位，向東北傳入皖南與浙江，往東傳入福建，往南傳入廣東。基於此，後人竟多以為種痘法源於江西。

（三）清代「種痘」字意的轉變

清初以降，「神丹種痘」被簡稱為「種痘」，「種痘」二字才專指人痘接種法。如洪若皐記載：「吾鄉從未有令人種痘者，壬子年（康熙十一年）予請閩人官時起，在家設壇下種，兩兒兩女，俱按期收功無恙。」[122]另外，康熙二十一年（1682）刊行的《倘湖樵書》說：「近有種痘者，

121 陸琰卓，《東邨隨筆》（上海：上海圖書館藏稿本），頁 20a-21a。按：原書無頁碼，此係筆者算出。

122 洪若皐，《南沙文集》（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廿七年〔1688〕友益齋刻本；以下簡稱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本），卷 7，〈東壁園隨筆．種痘〉，頁 43a。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本《南沙文集》，此段記載缺字頗多。筆者請孫承晟教授代查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所藏《南沙文集》（北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廿七年〔1688〕刻本），其內容亦有缺文；後轉請安介生教授代查復旦大學圖書館所藏《南沙文集》，始獲見其全豹。謹在此向兩位教授致上誠摯謝意！

臺灣大學醫學圖書館典藏

詭秘其術，以為神授，皆妄耳。」[123]康熙年間（1661-1722），徐無忝抄本《種痘仙方》云：

> 邇年有種痘之說，始自楚中江右，達於燕齊，近則遍行南北。詳究其源，云自玄女降乩之方。[124]

蘇州醫者張璐（1617-1700）《張氏醫通》（康熙三十四年〔1695〕刊刻）附載之種痘法亦有相同內容，但刪去「楚中」二字。[125]由此可以確定，《種痘仙方》應該成書於康熙初年或更早。《種痘仙方》又記種痘法之起源云：

> 昔有湖廣一富商，生子俱為痘殤。因極行善，虔奉天妃聖母、觀音大士，晚年得一子。遇一道人授以種痘法，遂得保全。因廣傳于人，至簡易，至真確，萬無一失。近來種痘者，恐人輕忽，故為神奇其說。[126]

康熙五十四年（1715），河南開封府杞縣人胡具慶（1685-1749）提到：「聞南方有種痘之術，凡種而出者，皆為順證。」[127]康雍之際，王崇炳（1653-1739）在《金華徵獻略》指出，種痘法減少了女子未嫁守節的機率：「予觀女之未嫁而守節者，其夫皆死於痘，痘之禍烈矣。自種痘法行，而死者鮮矣，其功豈鮮哉？」[128]另外，乾隆四十一年（1776）刊行之《嘯雪齋種痘法》說：「種痘一法，蓋為普天赤子於蠶叢重險中闢一

123 來集之輯，《倘湖樵書・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據清康熙倘湖小築刻本影印），卷 2，〈種牙種痘種鬚〉，頁 683。

124 徐無忝抄，蔣良臣刪節，《種痘仙方》（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刊本），〈種痘說〉，頁 3a。感謝李根利博士代為核查此一資料。

125 張璐，《張氏醫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據清康熙寶翰樓刻本影印），卷 12，〈附種痘說〉，頁 112。

126 徐無忝抄，蔣良臣刪節，《種痘仙方》，〈種痘後說〉，頁 13a；馬伯英，《中國醫學文化史（增訂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上冊，頁 490。

127 胡具慶，《甲初日記》（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康熙五十四年十月十四日」條，頁 63。

128 王崇炳，《金華徵獻略》（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 據清雍正金律刻本影印），卷 15，〈貞烈傳・明・王氏〉行間夾註，頁 50。

臺灣大學醫學期刊資料庫

坦途也。」[129]



圖三　清代醫書的兒童出痘圖

資料來源：左圖取自 Robert Temple, *The Genius Of China: 3,000 Years of Science, Discovery, and Inventio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6), p. 151; 右圖取自陳勝崑，《中國全集（4）：科技中國》（臺北：錦繡出版社，1982），頁 210。

康熙初年，種痘法雖騰空傳入北京，[130]但在江北卻流傳不廣。康熙十三年，曹煜寄給常典的信上，提到揚州尚未有神痘法，「若得此道行

129 轉引自王珠，《種痘心法要旨集註》（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刻本），〈原序〉，頁 2a。

130 杜家驥，〈清代天花病之流傳、防治及其對皇族人口之影響初探〉，收入李中清、郭松義編，《清代皇族人口行為和社會環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頁 157；張嘉鳳，〈清康熙皇帝採用人痘法的時間與原因試探〉，《中華醫史雜誌》第 26 卷第 1 期（1996 年 1 月，北京），頁 31。姜生，〈道教與種痘術〉，頁 233。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于廣陵，功德應自不淺，年翁當留意焉」。[131]康熙二十一年，鎮江府金壇縣學官任國錡（徐州蕭縣人）與曹煜言及種痘一事，有意將這種醫術推廣至家鄉，曹煜馬上派人找到吳鼎臣，請其前往拜會任國錡，並發一信給任國錡，內云：

> 大畧人生以痘為第一事，而種痘之法，向惟楚豫間有之，今獨太倉信而行之耳。弟幸至太倉，兩子俱得種痘之効，因知此道不可不通行於天下者也。年翁行之，為廣其道於徐淮間，使無子者有子，有子者多子，是亦功德之最鉅者矣。[132]

後續情況如何，不得而知。康熙五十二年（1713），石登巽就任滁州知州，後來聘江寧蔣良臣為幕友。康熙五十九年（1720），餘杭醫生朱升學在石公署中種痘，石家二十餘人經其種痘，下苗結靨，均極順利。蔣氏習醫數十年，甚感好奇，然朱氏秘其術不傳。數年後，蔣氏獲得仁和幕友徐無忝抄藏之《種痘仙方》三冊，於是刪其重複，補其闕略。至雍正十年（1732），好友王心渠加以刊行。[133]

乾隆年間及其後，各地仍有稱人痘法為神痘者，如康雍乾年間，徽州府績溪縣醫者方際遠「世種神痘，深明治痘之術」。[134]雍乾年間，寧國府南陵縣痘醫董上賁，在其校補的《痘疹專門》言：「近有種痘法，名曰神痘。神痘輕於流行，以流行為天氣所感，神痘為苗氣所觸。」[135]乾隆年間，廣州醫生簡福高家，突然有僧人上門投宿，兩人「傾蓋知交，

131 曹煜，《繡虎軒尺牘》，卷 2，〈寄常敘五〉，頁 31。

132 曹煜，《繡虎軒尺牘二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據清康熙傳萬堂刻本影印），卷 3，〈與任公冶廣文〉，頁 204。

133 徐無忝抄，蔣良臣刪節，《種痘仙方》，王心渠序、蔣良臣自序，頁 1a-4b。中國中醫研究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主編，《中醫人物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8），「蔣良臣」條，頁 604。

134 許豫和，《橡村痘訣》（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刊本），〈自序〉，頁 1a。

135 董維嶽原撰，董上貴校補，《痘疹專門》（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清光緒七年〔1881〕重刊本），卷下，〈痘症自悞案〉，頁 67a。

臺灣大學醫學期刊資料庫

談心相照」，僧人遂以神痘訣及技擊術相授。其子祿蔭，年方弱冠，資質聰明，福高教以僧人所授技術，數月即豁然貫通，尤其對神痘訣最能領悟，於是以治痘聞名。[136]嶺南惠州醫家陳復正（1736?-1795）在《幼幼集成》亦記載：「遂陽文庠立天張君有子三歲，於今春布種神痘。」[137]另外，咸豐七年（1857），貴州遵義人鄭珍（1806-1864）〈五孫種痘作二首〉詩註云：「方書有神痘法，即今以種納鼻之說。」[138]同治十二年（1873）中舉的山東滕縣士人王廷棟，其父王學經行醫，「精神痘法，無論貧富，有無謝意，皆一視活之」。[139]

清代湖廣種痘師頗具盛名。乾隆年間，章學誠（1738-1801）在《湖北通志檢存稿》記載湖北各縣主要行業，曾指出武昌府興國縣「半為小兒種痘」。[140]種痘成為當地特色職業，極為罕見。但至清中葉，湖南醫家已經不清楚當地在種痘法創生與傳播上早於江西，如嘉慶初年，湖南醫者鄭克壇說：種痘「法傳江右，達於京畿，湖南衡人復得其秘訣。」[141]即使如此，他點出「湖南衡人復得其秘訣」，仍具備論證上之意義。值得注意的是，杭州府錢塘縣人梁紹壬（1792-?）說：自種痘法出現後，「各相授受，以湖廣人為最」。[142]當時，湖南的神痘師常在江西吉安府境內活動，如道光《萬安縣志》所錄：「出痘之時，有耒陽縣人行其教，

136 簡朝亮編，《粵東簡氏大同譜》（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 據民國十七年〔1928〕鉛印本影印），卷 11，〈家傳譜・世傳・車陂系十九世金田公〉，頁 1768-1769。

137 陳復正輯訂，黃政德整理，《幼幼集成》（海口：海南國際出版中心，1996），卷 2，〈胎病論・新立誤搐類搐非搐分門別證・類搐十條・痘瘡〉，頁 6094。

138 鄭珍，《巢經巢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據民國三年〔1914〕花近樓刻《遵義鄭徵君遺著》本影印），《後集》卷 3，〈五孫種痘作二首〉，頁 503-504。

139 崔公甫、高熙喆修纂，民國《續滕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據民國三十年〔1941〕刻本影印），卷 2，〈人物志第八中・補遺〉，頁 560。

140 章學誠，《湖北通志檢存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據民國十一年〔1922〕劉氏嘉業堂刻《章氏遺書》本影印），卷 24，〈食貨考〉，頁 637。

141 鄭克壇，《彤園醫書・小兒科》（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卷後篇，〈痘中雜症・種痘源流〉，頁 1065。

142 梁紹壬著，莊崴標點，《兩般秋雨盦隨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卷 4，〈種痘〉，頁 2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曰神痘先生。」[143]袁州府也有相關記載，如民國《分宜縣志》提到：「小兒種天花，設壇祀天花娘娘，齋沐最虔，並以盛饌供養痘師。充痘師者多湘人。」[144]

三、神痘法及其後續分化

中國人痘接種法的發明，可能是不經意獲致。蔣似柏在〈種痘沿革考〉提出一個假設：有人得知人家孩子出痘輕，把自己的小孩傍著他睡，或把痘兒身上的衣服拿來穿。這樣故意出痘，就是種痘下苗的起源。[145]另外，前引高鏡朗也提到類似的說法。孔建民《中國醫學史綱》則曾這樣推論：稀痘方大量出現於嘉靖、萬曆間，這是服藥預防法。當時可能有人想到以毒攻毒可以減殺毒力，把曾發痘小兒的內衣，給未出痘的小兒穿上，待到出痘疱時，果然收到稀痘的效果，於是進一步試驗，改用痘痂研末吹入鼻孔，或用棉花蘸著痘漿塞入鼻內，終於試驗完成，發明了種痘法。[146]這一推測頗具可能性，但嘗試這樣做的到底是何類人？現存許多記載指向道士或方士之流，從神痘法、神痘教這些稱呼來看，不是沒有可能，只是如今無從查證。

天花病毒耐乾燥、低溫，痘痂可在乾燥狀態下保存一年仍具感染力。傳染途徑分為接觸傳染與飛沫傳染兩種，前者為直接接觸痘痂、膿汁，或由衣服、被毯等間接接觸；後者則可能與患者近距離接觸時，吸入其口鼻分泌物所致。[147]痘衣法、痘被法主要係透過皮膚接觸感染，讓患者

143 魏綳、張映宿修纂，道光《萬安縣志》（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卷 2，〈方輿志下・風俗〉，頁 209。感謝盧守曄、余輝同學代為核對此一資料。

144 蕭家修、歐陽紹祁等修纂，民國《分宜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 據民國二十九年〔1940〕石印本影印），卷 14，〈風俗・醮賽〉，頁 2098。

145 蔣似柏，〈種痘沿革考〉，《生命與健康》第 3 卷第 3 號（1929，上海），頁 3。

146 孔建民，《中國醫學史綱》，頁 185-186。

147 邱仲麟，〈明清的人痘法〉，頁 452。

臺灣大學醫學術期刊資料庫

發熱出痘。

長期以來，學界談人痘接種的種法，常依據《醫宗金鑑》所載的痘漿法、旱苗法、痘衣法、水苗法，但范行準認為，從歷史發展階段來看，這四種種痘法絕對不是同時發明，必有先後之別。據他推測，種痘法存在著由原始到細緻的演化過程，即從痘衣法→痘漿法→旱苗法→水苗法。這與《醫宗金鑑》謂古法獨用水苗與近世始用旱苗的先後不同，「蓋《醫宗金鑑》以法之馴暴為前後，凡是古的東西都是好的觀念作怪也」。[148]正如范氏所云，《醫宗金鑑》的記載無法反映人痘法的發展歷程，而且還將旱苗法與吹苗法混淆。為此，筆者擬透過文獻排比，考察各種接種法的時間序列，或許有助於了解神痘法的技術發展及其傳播的過程。

（一）痘衣法與痘被法

現存關於痘衣法的記載，可以追溯至崇禎年間。崇禎中葉，湖廣長沙府湘潭縣人賀久邵，在浙江溫州府推官任上，[149]因公務前往寧波，與寧波府推官李清（1602-1683）[150]談起家鄉的痘神奇蹟。後者在所撰之〈痘神紀異〉記載其事，提到痘衣法起源於湖廣，而痘衣法的治痘方式是：

> 凡諸兒之服此衣者，每逢七日，則熱發而痘見，每逢十二日，則痂落而體復。……尤可異者，凡傳衣之兒，必如傳燈相續，中滅則不燃。故一、二行術家，每遇春秋二季，則求者有如歸市，或博金錢以自肥；而時逢冬夏，則避熱畏冷，間同空谷之音矣。于是行術諸人，反多出金錢覓兒于家，以接衣而傳痘。異哉！[151]

148 范行準，《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頁 117-118。

149 賀久邵於崇禎八年至十年任溫州府推官，參見李琬、齊召南修纂，乾隆《溫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據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刊民國三年〔1914〕補刻本影印），卷 17，〈職官上・郡職・明・推官〉，頁 862。

150 李清於崇禎五年至十一年任寧波府推官，參見曹秉仁、萬經修纂，雍正《寧波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據清乾隆六年〔1741〕補刊本影印），卷 16，〈秩官上・明・推官〉，頁 1103。

151 李清，《李映碧公餘錄》（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 據明崇禎刻本影印），〈偶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當時，李清有嬰兒三歲，也因出痘而夭折，於是感慨湖廣痘神之靈妙，恨不得能有縮地之術相迎。分別之際，賀久邵執著李清的手安慰道：「予不日返東甌矣。若多覓數兒，往衣其衣，神將繇楚而浙矣。」李清回答：「幸甚。此神之德，亦公之德也。謹延頸跂足以待。」[152]事後，李清是否請人將痘衣法由湖廣傳至浙江，則不可知。

賀久邵提到的湖廣痘衣法，何時出現，現已不可考。但有資料指出，痘衣法可能在萬曆年間已經存在。順治九年（1652），董含（1624-1697）在《三岡識略》提到安慶有人施作痘衣法，其相應的方術極為特殊：

> 安慶張氏傳種痘法，云已三世。其法，先收稀痘漿，貯小磁瓶，遇欲種者，錄小兒生辰，焚香置几上，隨將黃豆一粒，傳以藥，按方位埋土中，取所貯漿染衣，衣小兒。黃豆三日萌芽，小兒頭痛發熱。五日豆長，兒痘亦發。十日而萎，兒痘隨愈。自言必驗。[153]

以位置而言，安慶府地處長江由湖廣、江西通往南京的中間地帶，張氏的祖父到底是在何處學得，還是有人到此地接種而傳授給他，現在均無從考證。由於痘衣法頗為原始，故傳入時間應該甚早。假設其祖父（或祖父、父親同時）在萬曆年間獲得此一技術，至董含記載時，亦符合三世之說。

湘西沅水上游則有「鋪被種痘」之法。康熙初年，鳳陽府壽州霍邱縣人張扶翼出任湖廣沅州府黔陽知縣（康熙元年至九年〔1662-1670〕在任），據言：「痘患為小兒一大關，湖南獨有異傳種，不知自何時始。」其技法主要在鋪被，即取種痘小兒出痘時所蓋的被子，裹住未出痘的小兒，「覆被中使受其氣」，大約經過七、八日至十四、五日開始發熱，再一、二日痘出。痘師種痘時，「一被所鋪，少或一、二兒，多而先後

筆・痘神紀異〉，頁 224、225-226。

152 李清，《李映碧公餘錄》，〈偶筆・痘神紀異〉，頁 227-228。

153 董含，《三岡識略》（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卷 2，〈種痘〉，頁 20a；董含著，致之標點，《三岡識略》（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卷 2，〈種痘〉，頁 32。並見董含，《蓴鄉贅筆》（臺北：廣文書局，1980），卷 1，〈種痘〉，頁 18a。

臺灣大學醫學院圖書館

相續，或至數十、百兒」，大約出者十之六、七，不出者十之三、四。黔陽縣托市的痘師宋泰來，曾將此法傳往貴州東部黎平府錦屏縣的亮寨司，試種每每有效。康熙三年（1664）夏初，宋泰來至黔陽縣城，小兒未出痘的，同時鋪被五十餘人，張扶翼的孫子張龍標及同宅眾小兒也一起種痘，僅出二、三百粒，「痘出而兒不苦」。計其至縣城一個多月，鋪被出痘者計四十餘兒，皆得以痊癒，未出者十之二、三而已。[154]宋泰來是如何學到痘被法並不清楚，但這種技術可能已存在頗長一段時間。

（二）神痘法的分化

從前引方象瑛〈神痘說〉的討論可知，神痘法基本上排除痘衣、痘被法，主要係指鼻苗法，而鼻苗法又分為痘漿法與痘痂法。醫者採取鼻苗法的思維邏輯，與前面的痘衣法、痘被法不同，係透過呼吸道感染的方式讓患者出痘。從諸多記載看來，這種方法被稱為「神丹種痘」，即神痘法。由於其療法與痘衣、痘被法相比，帶有明顯的身體侵入性，故醫家以神話及神道來說服病家，以便神奇療法得以施展。

現存關於痘漿法最早之記載，應為袁州府宜春縣人張自烈（1597-1673）所撰之《正字通》。《正字通》的前身為《字彙辯》，而張自烈在撰《字彙辯》之前，曾先撰成《增補字彙》。[155]張自烈著手編撰《字彙辯》始於崇禎九年（1636）；崇禎十五年（1642）初稿完成，友人方以智（1611-1671）為該書撰序；順治十三年（1656），由金陵道濟堂梓印發行。書稿撰成後，方以智等友人曾建議將《字彙辯》更名為《正字通》，但張自烈並未採納。其後，張自烈將書稿交給廖文英，廖氏對此書又有修訂，並以「正字通」為名重刊印行。[156]《字彙辯》現已失傳，

154 張扶翼，《望山堂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光緒十二年〔1886〕重刊本），卷 1，〈送種痘師宋泰來序〉，頁 11a-12a。

155 古屋昭弘，〈張自烈と『字彙辯』——『正字通』の成書過程〉，《東洋學報》第 74 卷第 3/4 期（1993，東京），頁 97-124；〈張自烈『增補字彙』について〉，《中國文學研究》第 19 期（1993，東京），頁 97-108。

156 楊義騰，〈《正字通》成書探考〉，《中國文化大學中文學報》第 23 期（2011 年 10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而據《正字通》〈痘〉條記載：「神痘法，丸痘汁納鼻，呼吸即出。」[157]考慮到作者為江西人，且神痘法在崇禎年間已流行於江西，故其記載應係當時現況之反映。

另外，方以智《物理小識》〈痘〉條亦記載：「神痘法，丸痘汁納鼻，呼吸即中矣。或取衣、被。久傳二、三十人，即有一惡，須易新丸痘。」[158]《物理小識》初稿係崇禎十六年（1643）五月完成於北京。[159]明亡後，以智飄泊西南，舊稿至順治七年（1650）始由「苗中」寄回桐城，其子方中通（1634-1698）據此分類編次。其後，于藻再加校訂，康熙三年刊行於廬陵知縣任上。[160]如前所言，方以智曾為張自烈《字彙辯》撰序，故《物理小識》〈痘〉條所述神痘法極有可能得自《字彙辯》。而《物理小識》〈痘〉條後半之小字，筆者懷疑是方中通或于藻所加。

在種痘法出現之初，神痘法即指痘漿法。[161]康熙初年，痘漿法的記載大量出現。如前引康熙十一年所修之《弋陽縣志》記載的神疹法就是痘漿法：「以棉絮取痘漿之佳者，傳入鼻內，及愈，有瘢如真。」[162]康熙十五年（1676）前後，泉州府晉江縣人林雲銘（1628-1697）提到的也是痘漿法：

> 其法擇兒童痘瘡之佳者，破其一二，用綿裹漿，封入小竹管內，臨時揭取，按男左女右，分塞鼻竅。或以他童患痘裹衣，穿服貼身，擁被蒙首而臥。不數日，皆能令發熱成痘，與自患同。[163]

月，臺北），頁 87-108。

157 張自烈撰，廖文英續，《正字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據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畏堂刻本影印），《午集》卷中，〈疒部・痘〉，頁 137。

158 方以智，《物理小識》（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據清康熙年間宛平方氏刊本影印），卷 4，〈醫藥類・痘〉，頁 480。

159 任道斌，《方以智年譜》（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頁 115。

160 方以智，《物理小識》，卷首，頁 403-404。

161 王珠，《種痘心法要旨集註》，〈痘漿種法〉，頁 2a。

162 陶耀修纂，康熙《弋陽縣志》，卷 8，〈人物志・藝術・國朝〉，頁 287b。

163 林雲銘，《吳山彀音》（濟南：齊魯書社，2002 據清康熙刻本），卷 5，〈種痘說〉，頁 520-5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這段文字中，提到痘漿疫苗的收藏方法，及種痘分「男左女右」，均為現存資料中最早的記載。林雲銘還提到用痘衣法具有同樣功效。值得注意的是，福建與江西流行這種痘漿法。

接著出現的是痘痂法。痘痂法又分為旱苗法、吹苗法、水苗法。早期的痘痂法，係沿用痘漿法既有的方式，以痘痂細末捏成丸，塞入鼻中，即旱苗法。如順治十四年（1657），潮州府揭陽縣「民間始請醫出痘，其術以好痘之痂，塞兒鼻內，吸其氣，所出皆吉，百無一失」。[164]旱苗法是因為痘漿難得所產生的替代辦法，康熙初年的許多記載還是以痘漿法做為優先考量，不得已才用痘痂法。康熙十年（1671）前後，種痘法傳入浙東的台州府，據洪若皐〈東壁園隨筆．種痘〉記載：

> 其法挑取孩兒已種好痘濃汁，用棉花浥之。不則，用痘靨研末亦可。加麝少許為丸，納兒鼻中。更取已種痘小兒衣，加兒身上。一、二日即發熱，報點起脹。聚膿收靨，百無一失。[165]

由此看來，接種之時，以棉花沾上痘漿或痘痂細末，捻成丸狀，納入鼻中，同時又蓋上痘衣，可以百無一失。另外，仁和徐無忝所抄《種痘仙方》〈取苗法〉說：「其種原是仙授，非尋常時痘之種，必須原是種出之漿，方可取用，將棉花勻如青豆大，揀選圓正、頂尖、飽綻之痘漿」，或取痘靨亦可。[166]《種痘仙方》之〈種痘說〉則云：

> 原其種痘之苗，別無他藥，惟是盜取痘兒標粒之漿，收入棉內，納兒鼻孔，女右男左。七日其氣自通，熱發見點，少則數點，多不過一、二百顆。……如痘漿不得盜，痘痂亦可發苗。痘痂無可發，則以新出痘兒所服之衣，與他兒服之，亦能出痘。[167]

---

164 陳樹芝纂修，雍正《揭陽縣志》（北京：中國書店，1992 據清雍正九年〔1731〕刻本影印），卷 4，〈祥異〉，頁 176。

165 洪若皐，《南沙文集》（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本），卷 7，〈東壁園隨筆．種痘〉，頁 42b。

166 徐無忝抄，蔣良臣刪節，《種痘仙方》，〈取苗法〉，頁 5a。

167 徐無忝抄，蔣良臣刪節，《種痘仙方》，〈種痘說〉，頁 1a-1b。張璐《張氏醫通》附載之〈種痘說〉所述內容相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種痘仙方》記載種漿苗法，以淨水將漿苗潤濕碎破，男左女右，塞入鼻孔內半寸許，外面再用棉花塞住。若使用痘靨，則以木槌隔紙敲成粉末，將棉花弄成圍棋大小薄片，用水打濕後，包裹痘靨粉末六釐在內，揑成小丸，綁上細線，男左女右，塞入鼻孔。[168]根據徽州痘醫允肅氏臨床經驗，痘漿法的發痘率「百發百中」，高於痘靨（痘痂）法的「間有一二不發」。[169]

吹鼻法的記載，晚於旱苗法。種痘師直接將痘痂細末吹入鼻孔，其思考方式與塞入或許有所不同。在此之前，中醫醫方將藥粉吹入鼻中並不罕見，故以痘痂研成細末吹入鼻中，亦不難說服患者或病家。吹鼻法最早的記載見於康熙五年，即方象瑛所撰之〈神痘說〉：

> 相傳昔有道士，憫痘症殺人，禮峨眉山四十九日，夢授某童子仙苗，翌日痘出，以其痂為屑，吹羣兒鼻中，七日壯熱，十四日瘳。復取痂厚潤者為苗，遞相傳種，百無一失。江右人便之，以為常。[170]

另外，蔣良臣在《種痘仙方》提到，他在康熙末年見到杭州朱升學的種痘法，與徐無忝抄本《種痘仙方》所載不同，是將痘靨搗碎，以小細彎竹筒或銀管，約二、三釐許，吹入鼻孔內；再以棉花潤濕，沾痘靨少許（如有漿苗更妙，不必用痘靨），塞住鼻孔，塞一晝夜取出。[171]這一方式是先吹苗，再用塞鼻法，塞鼻時以痘漿為優先考慮。

康熙後期，出現所謂的天姥種痘法（即水苗法）。在此之前，人痘法已有數種技法，即痘衣法、痘被法、痘漿塞鼻法、痘痂旱苗塞鼻法和痘痂旱苗吹苗法。天姥種痘法的出現，與朱純嘏等被徵召入京為皇家子女接種有關。康熙二十年（1681）八月，江西痘醫朱純嘏、陳添祥被徵召至京；第二年起，朱純嘏開始在宮內「為聖子、神孫、公主、郡主種

168 徐無忝抄，蔣良臣刪節，《種痘仙方》，〈種苗法〉，頁 5b。

169 允肅氏，《種痘書》（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圖書館藏清抄本微捲），〈種痘說〉，頁 3a。

170 方象瑛，《健松齋集》，卷 16，〈神痘說〉，頁 259。

171 徐無忝抄，蔣良臣刪節，《種痘仙方》，〈種苗法〉，頁 6a。

臺灣人學醫術期刊資料庫

痘」。[172]由於皇室成員身分金貴，接種必須謹慎，步驟也不得馬虎，而吹苗法「法雖捷徑，微覺迅烈」，[173]因此改為較溫和的水苗法。為了合理化這一技術，他說這是峨眉山「天姥之種法」。所謂「天姥之種法」，乃是痘痂旱苗塞鼻法的細緻化，其區別在於將痘痂研成細末，再加入水潤濕，捏成小丹丸，以紅絲線繫住，納入鼻中。據乾隆三十二年（1767）《重刻痘疹定論》記載天姥之種法如下：

> 峨眉山有神醫，能種痘，百不失一。其法以尖圓紅潤四字俱全痘痂研末，納於男左女右之鼻孔內。一歲之兒女，可用此痂三十粒。於淨磁鍾內，以柳木作杵，研此痂為細末。用潔淨棉花些須，又用潔淨之水，春秋溫用，夏則涼用，冬月略帶熱些，滴三、五點入於鍾內，乾則又加幾點。總以研勻不乾，捏成棗核樣，以紅絲線栓定，約留寸許，餘線剪去，納兒鼻中，露線在外，以防吸上。未滿一歲之兒，種六個時辰取出。若二、三歲之兒，種十個時辰取出，即種十二個時辰足亦可。此痘痂，春秋二季，即一個月之痂可種得。若夏五、六月，半月、二十日之痂亦可種。若冬月嚴寒，四、五十日之痂亦可種。蓋以寒則氣聚，熱則氣散，故時日有不同耳。至種苗取出，約計五日而五臟傳遍，至七日身必發熱。發熱三日，苗必現焉，見苗三日而出齊。出齊之後，痘必次第長漿，漿長三日而膿漿充足。既足漿，則回水結痂之候也。[174]

范行準在《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僅摘取「其法以尖圓紅潤四字俱全痘痂研末，納於男左女右之鼻孔內。一歲之兒女，可用此痂三十粒。於淨

172 朱純嘏，《痘疹定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據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刻本影印；以下稱《續修四庫全書》本），卷 2，〈種痘精神形氣論〉，頁 36。仲麟按：該書雖著錄為清康熙五十二年刻本，實際上為乾隆後期刻本，請參見本文第四節第二目。

173 吳謙等編，《醫宗金鑑》（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3），卷 60，〈幼科種痘心法要旨．種痘要旨〉，頁 1544。

174 朱純嘏，《重刻痘疹定論》（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重刊本；以下稱清乾隆三十二年重刊本），卷 2，〈種痘論〉，頁 31a-32a。感謝楊茜博士代查此一史料。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磁錘內，以柳木作杵，研此痂為細末」這一段文字，認為是「旱苗法較早的文獻。至水苗法則朱氏未有提及，蓋其時尚未發明」。[175]這顯然是一大誤會。朱純嘏雖未標舉「水苗法」之名，但其「天姥之種法」就是水苗法。朱純嘏在《痘疹定論》〈續補種痘之法〉特別提醒，大內僅可使用這種天姥傳授之法（水苗法）：

> 天姥教人種痘之法，已於前種痘論中詳矣。今復續補種痘之法，此乃後人之變法也，亦似有理。若在大內種痘，必須依天姥之種法。至於窮鄉僻壤，則以續補種痘之法亦可。[176]

最為奇怪的是，《痘疹定論》未提及痘痂旱苗塞鼻法，原因可能是為了自圓其說，表示痘痂法一開始出現就是水苗法，而旱苗法係水苗法的簡化。至於其所謂「後人之變法」則有三種，即民間使用的痘衣法、痘漿法、吹鼻法。吹鼻法的銀管，是用紋銀打造，約五寸長，「先著痘痂末於管內，對上鼻孔，輕吹入於鼻內」。痘衣法則是當孩童出痘足漿三、四日時，取其貼身衣服，給未出痘之兒女穿，穿上兩三日，夜間也不可脫下。這種方法透過衣傳，「然恐砌薄不透，多有不熱不出」。至於痘漿法，他則嚴厲批評：「若夫狂妄之輩，挑破痘漿而作種，若此乃不仁之人，不必再言之矣。」[177]

（三）各取所需與諸法並行

雍正四年（1726），耶穌會士殷弘緒從北京寫信回歐洲，在信上介紹了宮中御醫給他的種痘處方，說是一百年前發明的。其處方有三種，第一種取四或兩個痘痂，在痘痂中間放入少許麝香，用棉花包裹好，塞入鼻孔，男左女右。第二種將一定分量的痘痂，放入蠶繭內，塞進鼻孔中，或以溫水將痘痂拌成糊狀，用很薄的棉花包裹，塞進鼻孔裏，均是男左女右。第三種取五、六顆痘痂，年紀較大的孩子可加一兩粒雄黃，

175 范行準，《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頁 118。
176 朱純嘏，《痘疹定論》（《續修四庫全書》本），卷 6，〈續補種痘之法〉，頁 35。
177 朱純嘏，《痘疹定論》（《續修四庫全書》本），卷 6，〈續補種痘之法〉，頁 35。

臺灣大學醫學期刊資料庫

一起研碎，用棉花包好，放入鼻孔中。[178]由此看來，太醫主體上採用痘痂旱苗法。殷弘緒介紹的處方，除第二種包括旱苗法與水苗法外，其他兩種均為旱苗法。

乾隆七年（1742），吳謙《醫宗金鑑．幼科種痘心法要旨》將先前的種痘法歸類為四種，即水苗種法、旱苗種法、痘衣種法和痘漿種法。其中，《幼科種痘心法要旨》最推薦水苗法：

> 嘗考種痘之法，有謂取痘粒之漿而種之者，有謂服痘兒之衣而種之者；有謂以痘痂屑乾吹入鼻中種之，謂之旱苗者；有謂以痘痂屑濕納入鼻孔種之，謂之水苗者。然即四者而較之，水苗為上，旱苗次之，痘衣多不應驗，痘漿太涉殘忍，故古法獨用水苗，蓋取其和平穩當也。近世始用旱苗，法雖捷徑，微覺迅烈。若痘衣、痘漿之說，則斷不可從。[179]

必須注意的是，《幼科種痘心法要旨》也沒有談到痘痂旱苗塞鼻法，其提到的「旱苗種法」乃是痘痂旱苗吹苗法。而引文中所謂「古法獨用水苗」，自是一種說詞，並非實情；至於「近世始用旱苗」，則是被《痘疹定論》所誤導，畢竟「旱苗種法」（吹苗法）要早於水苗法。

然而，《痘疹定論》、《醫宗金鑑》力推的水苗法，雖亦有醫家採用，但史料所載，還是以吹苗法為主，如王應奎（1683-1760?）《柳南續筆》記載：「其法擇痘之最上者，取其痂以為苗，傅以他藥，吹入鼻孔。」[180]嘉慶二十五年（1820），李兆洛（1769-1841）記種痘法為「擇

178 參見〈耶穌會傳教士殷弘緒神父致本會杜赫德神父的信〉（1726 年 5 月 11 日於北京），收入杜赫德編，朱靜等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III）》（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頁 212-216。另參見杜家驥，〈從清宮醫案看天花的防治——種痘與治痘〉，收入常建華主編，《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 8 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頁 63-65。

179 吳謙等編，《醫宗金鑑》，卷 60，〈幼科種痘心法要旨．種痘要旨〉，頁 1543-1544。

180 王應奎撰，王彬、嚴英俊點校，《柳南隨筆》（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 3，〈種痘〉，頁 174-17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好苗研末，俟天氣秋潤，從小兒鼻孔吹入」。[181]另外，道光《萬安縣志》記載神痘法：「以痘痂輾末，吹入鼻中，男左女右，曰傳苗。其傳苗小兒，曰花童。」[182]

基於《痘疹定論》和《醫宗金鑑》一再呼籲，痘漿法甚少再見於中文資料，但在外國人的記載中卻不乏其例。如馬戛爾尼使節團的成員斯當東記載中國人常見的接種方法是：當某地爆發天花時，醫生小心翼翼地從熟痘上收集一定數量的膿漿，晾乾研碎，密封入小瓷瓶以隔絕大氣；以這種方式，可保持其性能數年；種痘時，將少量粉末撒在一小塊細棉絮上，放入被接種者的鼻孔中。[183]另一位隨員巴羅（John Barrow, 1764-1848）則說：（在中國）接種法，或者說以人工感染，逐漸普及。其用法是將膿汁沾在棉球上塞進鼻孔，或穿上其衣服，或與其同睡一張床，這樣都可以奏效。[184]比較上，斯當東所述是痘漿法之變法，而巴羅的記載則包括痘漿法、痘衣法與痘被法。

嘉道之際，湖南出現了一種新的人痘接種法——點苗法。道光二十六年（1846），陳東嶺（寶慶府新化縣人）在《種痘奇書》自序談到，點苗法自廣東劉神醫（應即劉施生），族兄陳咸亨得其親自傳授，咸亨又口授東嶺，東嶺按方行醫數十年，毫無所失。[185]據長沙府安化縣人羅繞典（1793-1854）說：陳氏所傳原是牛痘法，但因牛痘苗不易得，他於是變通其術，以人痘苗替代，為小孩種痘。此法在他家鄉特別受到推崇，後來前往山西及黔南任官，「東嶺皆挾藥囊相隨，至輒奏效」。[186]陳東

181 李兆洛，《養一齋文集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據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增修本影印），卷 6，〈記引痘法〉，頁 402。

182 魏緗、張映宿修纂，道光《萬安縣志》，卷 2，〈方輿志下・風俗〉，頁 209。

183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vol. 2, pp. 535-536.

184 John Barrow, *Travels in China, Pekin to Canton* (London: T. Cadell and W. Davies in the Strand, 1804), p. 350.

185 陳東嶺，《種痘奇書》（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圖書館藏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刊本微捲），自敘，頁 1a。

186 陳東嶺，《種痘奇書》，羅敘，頁 1a-b。羅繞典於道光十六年（1836）任山西平陽府知府，十九年（1839）擢陝西糧道，二十一年（1841）遷山西按察使，二十四年（1844）

臺灣大學醫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嶺發明的點苗法，乃是接種於手臂的人痘接種法。據東嶺自言：「點苗之法，不擇苗，亦不入鼻，但將肱旁一穴，名曰曲外，將小刀刺破，置苗於上，以所製之藥敷之」，[187]如此即可。則中國的人痘接種法，其歷程應增補為痘衣（被）法→痘漿鼻苗法→痘痂旱苗法→痘痂吹苗法→痘痂水苗法→手臂點苗法。至於民國醫史學界所謂明末林屋山人創針刺法之說，應該也是偽託。

點苗法（人痘臂種法）的好處，是僅接種之處附近發痘，除非感染破傷風，否則其安全性提高頗多（參見圖四）。但可能牽涉到劃破皮膚，故大部分士大夫並不推薦。一直到晚清，中文史料所記，仍以吹苗法為主，特別是後者更為常見，如江西瑞州府新昌縣，「人多用吹苗法」。[188]湖南長沙府湘鄉縣，「痘科用吹苗法」。[189]光緒年間，許起《珊瑚舌雕談初筆》記載：「今之種痘一法，不知始於何人，其法擇痘之最上者，取其痂以為苗，吹入鼻孔。」[190] 1881 年，印度藏學家 Sarat Chandra Das（1849-1917）在西藏也見到當地醫生使用吹苗法。[191]

不過，從西方人的記載可見臂種法還是有其受眾。咸豐八年（1858），上海仁濟醫館醫生合信（Benjamin Hobson, 1816-1873）與華人管茂材合撰之《婦嬰新說》提到：「種痘有新舊二法，舊法取出痘輕者之痂塞鼻，或略破外皮，取痘漿沾接，中土稱為苗痘。」[192]《婦嬰新說》提到的舊

遷貴州布政使。

187 陳東嶺，《種痘奇書》，〈種痘論〉，頁 2a-3a。

188 朱慶萼、黃大承等修纂，同治《新昌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 據清同治十一年〔1872〕刊本影印），卷 19，〈技術・劉森然〉，頁 1998。

189 齊德五、黃楷盛等修纂，同治《湘鄉縣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據清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影印），卷 18，〈人物・范正瑜〉，頁 3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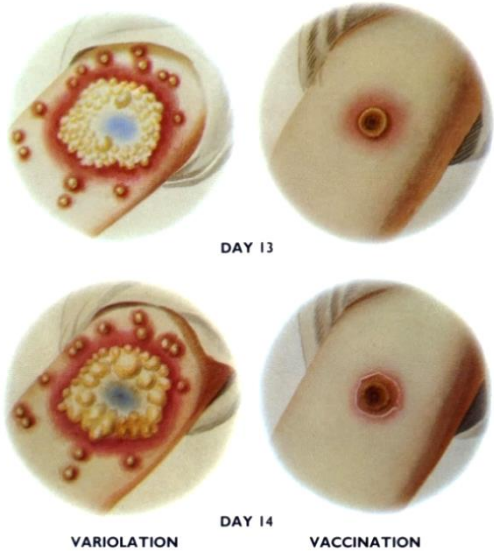
190 許起，《珊瑚舌雕談初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據清光緒十一年〔1885〕木活字印本影印），卷 1，〈種痘〉，頁 520-521。

191 Sarat Chandra Das, *Journey to Lhasa and Central Tibet* (London: John Murray, 1902) , p.257.

192 合信氏、管茂材同撰，《婦嬰新說》（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據清咸豐八年〔1858〕刻本影印），〈種痘論〉，頁 359。民國八年（1919），陳邦賢曾引述這一段話，見氏著，《中國醫學史》（上海醫書局版），頁 110b。

臺灣大學醫學院圖書館藏

法，為旱苗法與點苗法，可見除了旱苗法之外，點苗法在上海有其市場。民間採取臂種法的例子，在下文中還能見到。



圖四　人痘臂種法與牛痘臂種法的比較

資料來源：Fenner et al., *Smallpox and its Eradication*, p. 250.

同治十一年（1872），旅居中國的泰勒醫生，曾向西方世界報導中國有趣而獨特的人痘接種風俗：當小孩約兩歲大時，媽媽會到小孩出天花的鄰居家中，乞求一些病毒，沾上棉花後，放入自己小孩的鼻孔中。[193] 另外，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旅居中國多年，他在著作中提到，中國的人痘接種技術存在已久，接種時將脫脂棉沾上病毒塞進鼻孔，種牛痘時偶爾也使用這種方式。[194]

193 n/a, “Inoculation in China,”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614 (1872, London), p. 391.

194 Samuel Wells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A Survey of the Geography, Government, Literature, Social life, Arts, and History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d its Inhabitants*, vol. 2 (London: W. H. Allen & Co., 1883), pp. 132-133.

臺灣大學醫學圖書館

至於《醫宗金鑑》認為不靈、不可用的痘衣法，一直到清末還是存在。道光年間（1821-1850），湖州人程岱葊引述《蕅鄉贅筆》所記安慶張氏痘衣法時曾說：「其法今不傳，即或有之，亦詭異不可試。」[195]但下層百姓還是選擇痘被、痘衣法種痘。咸豐十一年（1861），雒魏林醫生告訴芮尼醫生（David Field Rennie, ?-1868），上海仍使用比較便宜、但聽來令人毛骨悚然的方法給兒童預防天花，即和感染天花者睡在同一張牀上，或穿著患過天花的兒童的衣服，或沾病人的痘痂等。芮尼在北京則沒有聽過這種事。[196]下層百姓所以選擇這種原始的方式，是費用較為低廉。就此而言，接種人痘的消費市場，階層區隔還是相當明顯，並未被太醫所推薦的接種法「標準化」或「一致化」。光緒三年（1877），旅居福州的醫官索莫維爾（J. R. Somerville）提到：當地的人痘接種法有吹苗法和痘衣法兩種。[197]光緒二十五年（1899），康德黎醫生（James Cantlie）談到香港使用的幾種人痘接種方式，分別是吹苗法、痘衣法與臂種法。[198]清朝末年，俞樾（1821-1906）引述《蕅鄉贅筆》所載安慶張氏痘衣法時曾說：「今種痘盛行，而張氏之法失傳矣。」[199]是否真的如此？其實不然。

清朝末年，惲鐵樵曾指出，鼻苗法比自然出天花，症狀輕而時間短，僅較牛痘略重一些，而且有終生免疫的好處。直至如今，內地鄉僻之區仍沿用此法，為的是能去毒乾淨，且成績較牛痘更好——牛痘的效力，

195 程岱葊，《野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據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廛隱廬增修本影印），卷 7，〈又引痘法〉，頁 98。

196 David Field Rennie, *Peking and the Pekingese during the First Year of the British Embassy at Peking*, vol. 2 (London: John Murray, 1865), p. 119. 中譯本：李紹明譯，《北京與北京人》（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頁 321-322。

197 J. R. Somerville,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Foochow for the Half-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77,” *Chinese Imperial Customs Medical Reports* 14 (1877, Shanghai) , p. 90.

198 James Cantlie, “Inoculation and Vaccination for Smallpox amongst the Chinese,”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1501 (1899, London), p. 761.

199 俞樾撰，貞凡等點校，《茶香室叢鈔》（北京：中華書局，1995），卷 21，〈種痘〉，頁 86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據西人說只有十年。[200]因此，迄至民國，人痘舊法仍在寧波、上海、杭州、南京等地流行。民國十年，萬伯英談人痘惡法，舉的是「取患者之痂皮，吹入種者之鼻腔，或以患者之衣服，裹纏於被種者之身」。[201]另外，William Wesley Peter（1882-1959）談到所見的人痘接種方式，一為水苗法，其次為吹苗法，偶爾也有人使用劃破皮膚的點苗法。[202]而江西種痘師為人吹苗，常父子或兄弟一起行動。[203]在西南一帶，則存在吹苗法種痘師跨省際的活動。民國時期，「四川吹花土醫」在特定季節，常進入雲南為人接種。[204]

四、神痘教神話與神道設教

如前所言，若干學者曾相信朱純嘏《痘疹定論》所載：人痘接種法起源於北宋之峨眉山。然而，清人已指出這些都是假託。咸豐二年（1852），趙克宜校刊重刻《痘疹定論》，在〈種痘論〉標題下就有按語：「是論立法甚善，惜託諸神道，轉非大雅。」[205]抑且，從以上的討

200 惲鐵樵，《幼科講義》第 2 期，頁 1-2。

201 萬伯英，〈天花（痘）瑣語〉，《廣濟醫報》第 6 卷第 5 期（1921，杭州），頁 39。

202 William Wesley Peter, *The Heavenly Flower: Smallpox* (Shanghai: The American Red Cross, 1920s), p. 15.

203 民國十九年初，以舊法種痘的痘師龍元奇、龍江生、龍乾生、譚維屏、譚鶴鳴、周奇昌、周秀奇、龍吉祥、龍壽章、龍福章、龍義章、龍松山、蕭鴻仂、侯禿仂、羅茂坤等，流寓於餘干、餘江、東鄉、萬年、鄱陽、進賢各縣，為人佈種天花。餘干縣種痘局長楊祖堯等為此上呈省府嚴禁，民政廳長王尹西（1893-?）於是訓令各縣嚴行取締。參見王尹西，〈訓令各縣縣長據餘干縣種痘局長楊祖堯等呈報有素行舊法種痘之龍元奇等流竄餘干等縣佈種天花仰即嚴禁由（社字第五〇四號）〉（十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江西民政公報》第 62 期（1930，南昌），頁 57。

204 〈訓令各屬嚴禁吹花惡習提倡新法種痘以保嬰孩健康由〉，《雲南民政月刊》第 14 期（1935，昆明），頁 49。

205 朱純嘏，《重刻痘疹定論》（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清咸豐二年〔1852〕重刻本；以下稱清咸豐二年重刻本），卷 2，〈種痘論〉，頁 26b。感謝楊茜博士代查此一史料。

臺灣大學醫學期刊資料庫

論可知，在晚明神痘法出現後數十年內，這種技術在長江中下游及閩廣等地迅速傳播，而四川卻在史料記載中缺席，正可反證所謂峨眉山創生神痘之說僅是一種「神話」。

1994 年，馬伯英在《中國醫學文化史》說：「北宋初峨眉山一帶有種痘法出現，不會是空穴來風」，而且「十一世紀前後四川及河南一帶已有種人痘法實行，比較可信。但仍只在民間散傳，未曾廣行」。[206]十多年後，他在 2010 年增訂版放棄此一看法，並指出這一神話之不可信者有四：其一、峨眉山為佛道聖地，往來香客甚多，如此神醫奇蹟，路人焉有不聞之理？在宋代，竟未曾流傳與記錄，故不可信。其二、宋代醫學是中醫史上的一個高峰，傑出醫生與醫書頻頻出現，何以丞相府中有神醫而獨無人知曉？也未曾留下隻字片語記載？可知當時人痘法尚未問世。其三、北宋以後，醫學繼續繁榮，若人痘接種技術已如此成熟，怎可能不被透露？一種好的技術、一件重要而影響生命健康的醫學發明，沒沒無聞數百年，這是不可想像的。其四、神話中所運用的痘痂法，已是種痘技術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並非一開始就有的技術。[207]

（一）從三神人到金花聖母上中下三座娘娘

從史料學的角度看，神話在證據的位階並不高，引證上原就有其疑慮，很難據以為定論。神話雖不能作為定年的依據，卻可作為考證之輔助。而且，從神話的內容也可間接印證湖廣為人痘接種法的誕生地。崇禎年間，李清〈痘神紀異〉記載湖廣的痘衣法，提到這種醫術係來自三位神人傳授：

> 先因楚有一民家，曾生數兒，皆以痘亡，于是夫婦忽發一願，誓點竈燈，其三年之勤勤心香者，如初朝也。偶一日，有三人晝寓伊家，而夜示之以夢曰：「吾非人也，神也。為爾誠所感耳，若簡吾臥闥上，有衣存焉，其亟衣女兒，并為予廣衣他兒，則效當立見。」時

206 馬伯英，《中國醫學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頁 810-811。

207 馬伯英，《中國醫學文化史（增訂本）》，上冊，頁 488-489。

臺灣大學醫學期刊資料庫

> 民家夫婦驚覺，啟戶視之，人杳然也，惟衣存耳。衣之，而效果立見。……其事神也，必誠。或主人積日而懈，不則童僕等微加以謔，則其神至而復去，去則不驗。若其神至也，則有求立應，然皆以夢傳，如家人、父子之接語，可操券而取也。[208]

由此可見，神人創造人痘法之說，早在晚明已經存在於湖廣一帶。湖廣的這位百姓因為虔誠祭祀灶神三年，後來三位神人前來借宿，夜間託夢傳授痘衣，從而創生痘衣法，衣衣相傳，救護了無數嬰兒。

前面提到，明朝後期衡州府有神痘教，所奉祀之神叫金花天母。天啟年間，胡應台因引入神痘極為靈驗，故創建好生祠奉祀金花天母，後因崇禎末年戰亂而燬，至康熙初年才又重建。神痘教之名，後續未再見於記載。所謂神痘教，大約僅泛指信奉神丹種痘技術及金花天母的一種信仰，並非嚴格的宗教。康熙初年，傅商霖〈《廣布天花說》序〉的記載也提到三道人，且是金花聖母分上、中、下三座娘娘：

> 客問：「種痘何昉乎？」予曰：「相傳宋仁宗時，湖廣一太守，子患危痘，諭能治者酬千金。時三道人從峨眉來云：『洗去前痘，另換種，痘自安。』太守依法調治，果愈。遂拜求其術以救嬰兒，道人藏書香爐下而去。啟視之，知為紫清宮真人。種痘法事聞于上，勅封天妃無極金花聖母上、中、下三座娘娘。由是廣其傳于三閩、江右間。……」[2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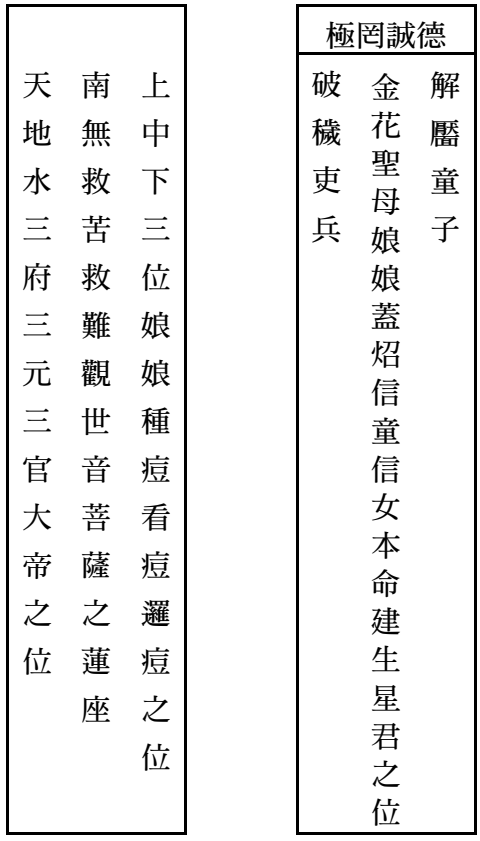
雖然〈《廣布天花說》序〉所記與康熙《瀏陽縣志》所載有一字之差，但「金花天母」與「金花聖母」應該是同一女神。另外，《廣布天花說．附符法》的〈聖母經〉也提到「太上三橋王母金花橫覺夫人，上橋王母

208 李清，《李映碧公餘錄》，〈偶筆．痘神紀異〉，頁 223-224。

209 傅商霖，《廣布天花說．附符法》（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十八年〔1679〕抄本），上冊，〈《廣布天花說》序〉，頁 1a。仲麟按：中國中醫科學院圖書館藏之《廣布天花說．附符法》二冊，與《痘症通治》一冊，雖被合在一起收藏，但據筆者翻閱考察，兩者並無關連，故應分開對待。而《廣布天花說．附符法》的作者，應即傅商霖。

臺灣大學醫學歷史資料庫

金七娘，中橋王母金八娘，下橋王母金九娘」。[210]《廣布天花說．附符法》中的〈起座寫牌位勅法秘旨〉涉及諸多神祇，開頭的一副神位提到上中下三位娘娘，另一副則為金花聖母。[211]（參見圖五）



圖五　《廣布天花說．附符法》所載起神神位之一

資料來源：傅商霖，《廣布天花說．附符法》，上冊，〈起座寫牌位勅法秘旨〉，頁 3a-3b。

210 傅商霖，《廣布天花說．附符法》，上冊，〈聖母經〉，頁 16a。

211 傅商霖，《廣布天花說．附符法》，上冊，〈起座寫牌位勅法秘旨〉，頁 3a、3a-3b。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清代徽州府婺源縣日用類書《應酬便覽》亦載有一份〈神痘堂對聯〉，痘神是金花聖母三位娘娘。（參見圖六）這則對聯所供奉的敕封金花聖母三位娘娘，與《廣布天花說．附符法》所載也可互證。直至清末，湖廣地區金花聖母的信仰依然存在，特別是醫家多有供奉者，如武昌醫家朱氏家中祖龕上層供奉三個牌位，中為「天地君親師」，左為「敕封藥王之位」，右為「天花金花聖母之位」。[212]

湖廣痘神係三位娘娘，在地方志中亦有記載，如清朝初年常德府龍陽縣南關的冷水寺，「原祀痘神者三」，乾隆年間增加痘神張姥（1626-1648），四人皆是女神。[213]有趣的是，清代湖北的三位女痘神還傳播至陝西，成為當地百姓崇信的對象，如嘉慶《延安府志》記載：安塞縣城萬壽寺東邊有痘疹娘娘廟，神姓高氏、王氏、方氏，原為徐州人，「顯化于峨眉，香火甚盛，荊襄及秦中多祀之」。[214]其記載雖甚簡略，但與前面提到的痘神是三位女性不謀而合。其中，女痘神生於徐州之說，與《廣布天花說．附符法》所記聖母「生身住在徐州府，峨眉山上立壇場」；[215]以及道教科儀提到的四洲大聖行痘痲娘娘，「生身住在徐州府，峨眉山上立壇場」，[216]相契度極高，可以印證兩者之間的關連性。

212 朱峙三著，章開沅選輯，《朱峙三日記》，收入《辛亥革命史叢刊》第 10 輯（北京：中華書局，1999），「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十四日」條，頁 331；王振忠，〈《朱峙三日記》所見晚清武昌縣民俗及其變遷〉，《民俗研究》2001 年第 1 期（濟南），頁 115。另參朱峙三著，胡香生輯錄，《朱峙三日記》（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壬寅日記》，「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十四日」條，頁 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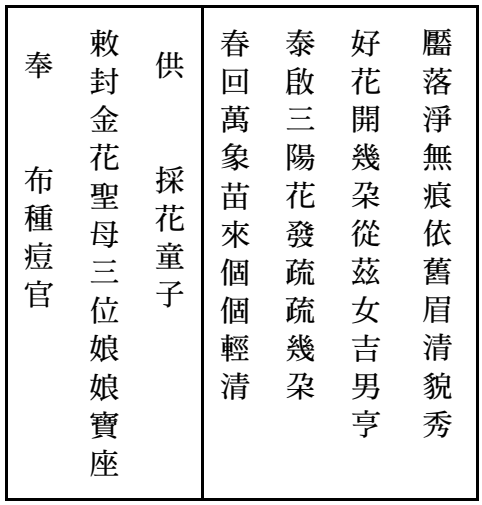
213 應先烈、陳楷禮等修纂，嘉慶《常德府志》（長沙：嶽麓書社，2008 據清嘉慶十八年〔1813〕刻本影印），卷 12，〈秩祀考．寺觀．龍陽縣〉引《龍陽縣志稿》，頁 191；張在田、游鳳藻等修纂，嘉慶《龍陽縣志》（北京：中國書店，1992 據清嘉慶十九年〔1814〕刻本影印），卷 5，〈列女下．女仙〉，頁 437。

214 洪蕙纂，嘉慶《延安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據清光緒十年〔1884〕補刊本影印），卷 36，〈祠祀．安塞縣〉，頁 1028。

215 傅商霖，《廣布天花說．附符法》，下冊，〈符法〉，頁 1a。

216 佚名，《宴謝痘痲娘娘行科》，收入李崇仰編，《中國符咒百科全書》第 1 輯（臺北：集文書局，1999），頁 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六 婺源日用類書《應酬便覽》中的神痘堂對聯

資料來源：轉引自王振忠，〈清代徽州民間的災害、信仰與相關習俗——以婺源縣浙源鄉孝悌里鳳騰村文書《應酬便覽》為中心〉，《清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北京），頁 109。

江西受到神痘教傳播的影響，許多地方的痘神也都是三位女性，有時加上許真君（許遜），贛南的瑞金縣就是一例，如雍正二年（1724），楊方堅之〈聖母宮碑〉云：「聖母宮，所以祀痘神也。神像四，女而冠帔者三，男而幞頭袍笏者一。未詳出自何代，并爵里姓氏。相傳得道于蜀峨眉山中，沒後為痘疹之神，司人間赤子之命。」[217]南昌縣城天花祠供奉的痘神也是三尊女像。嘉慶七年（1802），黃中傑之〈創建痘神專祠記〉云：「神痘之說起於宋代，而其神則道家《真誥》所稱掌痘曹大仙姑，所祠三神像皆隸部下，傳聞如此，然載籍無明文。」[218]嘉慶年間（1795-1820），撫州府臨川縣人樂鈞（1766-1816）亦云：

217 郭燦、黃天策等修纂，乾隆《瑞金縣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據清乾隆十八年〔1753〕刻本影印），卷 7，〈藝文志〉，頁 397。

218 許應鑅、曾作舟等修纂，同治《南昌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 據清同治十二年〔1873〕刊本影印），卷 13，〈典祀．南新祠廟〉，頁 1235-1236。

臺灣大學醫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 痘神何神也，姑勿深考。或曰居峨眉山，姐妹三人，身著麻衣，蓋女仙之流。主人間痘疹之疾，人呼為麻娘娘云。神甚靈顯，而嚴于小節。病痘之家，為位奉之，言語稍不檢，衣物稍不潔，及誠敬少懈者，病者輒作神言語呵譴之，雖私隱無不昭揭。其甚者，痘或不治，為得罪于神也。[219]

清代贛南各地有許多仙太閣、仙太廟，廟中供奉的天花聖母，俗稱三仙太，即雲霄、碧霄、瓊霄三位娘娘。[220]建於明代的贛州七鯉鎮仙娘廟，嘉慶元年（1796）及道光八年（1828）、十四年曾先後重修，原名天花宮，後改稱仙娘古廟，農曆三月二十日天花聖母雲霄、碧霄、瓊霄三位娘娘生日當天，有盛大的祭祀與神誕活動。[221]贛縣北境的白鷺村，村裏的仙娘閣亦奉祀三位娘娘，每逢小孩「出花」、「收花」，家人都要到此燒香，祈禱仙娘保祐，因此香火常旺不斷。[222]

另外，晚清民國的績溪雜抄文書中，祭祀痘神娘娘的科儀〈祭天花娘娘文〉一開頭即曰：「致祭于天花田、柳、霍三位之神前」，[223]雖然其與婺源供奉的金花聖母三位娘娘有所不同，但卻同樣是三位女神。

（二）從番僧到峨眉山神醫

崇禎年間，李清〈痘神紀異〉記載痘衣法創生神話時，還提到：賀

---

219 樂鈞著，石繼昌校點，《耳食錄》（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87），卷 4，〈望都宰〉，頁 59。

220 蔡策，《客家民俗——談贛南》（臺北：老古文化事業公司，1997），頁 71、78；曾材，〈寧都城廂的寺廟與廟會〉，收入劉勁峯主編，《寧都縣的宗族、廟會與經濟》（香港：國際客家學會等，2002），頁 277-280；周建新，《江西客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 114。

221 張嗣介，〈贛州仙娘古廟與太太生日〉，收入羅勇、林曉平主編，《贛南廟會與民俗》（香港：國際客家學會等，1998），頁 114-141；鍾俊昆，〈江西客家仙娘廟會調查〉，《尋根》2010 年第 4 期（鄭州），頁 76-81。

222 曹良海主編，《贛南客家古村白鷺》（北京：方志出版社，2004），頁 63。

223 王振忠，〈徽州與衢州：江南城鄉的片斷記憶——稿本《靜寄軒見聞隨筆、靜寄軒雜錄》初探〉，《社會科學》2011 年第 3 期（北京），頁 161 註 8。

臺灣人類學期刊資料庫

久邵的父親原對痘神甚為排斥，後來還是請神到家中，將為兩位女兒祈痘。當晚即夢到神明，指責他先前曾毀謗祂。賀老先生於是叩頭謝過，隔夜痘神才顯靈，而他兩位女兒之痘疹，應時而見，如期而落，與諸家無異。一時眾人都竊竊私語，莫知是何神。就在這當下，來了一位番僧，感嘆道：「若今亦至中國耶？」眾人圍著番僧，相詢祂是何神，番僧堅持不肯說，理由是：「吾一言，則神將去，曷若留神以濟。」[224]從這個故事看來，神痘法草創之時，故事中的神祇是某處的番僧。

而眾所周知的峨眉山神人傳授神痘法的神話，其原型就來自湖廣的金花天母。如前所引述，〈《廣布天花說》序〉提及三道人從峨眉山來，而這三位道人即「勅封天妃無極金花聖母上、中、下三座娘娘」。[225]崇禎初年，南昌府奉新縣創建天姥宮，則提到神痘法來自西蜀的神祇。據順治《奉新縣志》記載：「天姥宮，在北門外城隍廟之東。崇禎初年，邑人有自西蜀傳神痘之法來者，神靈著如响，民感神功，建宮祀之。」[226]這段內容可分為兩部分來看，其一為神痘法傳入奉新縣時，峨眉山創生神痘法之說已經存在；其二，神痘法頗為靈驗，百姓創建天姥宮供奉神痘教之神。

隨著神痘法的傳播，峨眉山的神話持續在它地重製，添入新的細節並變換主演的神祇，這樣的故事也出現在浙江。湖州府德清縣生員胡璞，於崇禎殉國後，「佯狂棄家，而精於醫」，習得種痘法返家，當時湖州無種痘法，胡璞乃假托是峨眉山人所創，「後遂傳播」。[227]近人章次公據此，遂認為峨眉山人創神痘法之說乃胡璞所假造。實際上，這個神話在晚明就存在於湖廣和江西，胡璞不過加以重製罷了，但其內容如何則已無可考。或許因為如此，蘇州城閶門外的種痘仙師廟，拜的是男性道

224 李清，《李映碧公餘錄》，〈偶筆・痘神紀異〉，頁 226-227。

225 傅商霖，《廣布天花說・附符法》，上冊，〈《廣布天花說》序〉，頁 1a。

226 黃虞再、閔鈺修纂，順治《奉新縣志》，卷 14，〈雜志・寺觀〉，頁 2a。

227 周紹濂、蔡榜等修纂，嘉慶《德清縣續志》（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嘉慶十三年〔1808〕原刊、民國十年〔1921〕修志事務所石印本），卷 8，〈人物志〉，頁 21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教真人，且與峨眉山相牽涉，如張紫琳《紅蘭逸乘》記載：「閶門外有種痘祖師廟，昔聞先伯萍廬公云，種痘祖師為峨眉山真人，居蜀峨眉山，始教人種痘者，蓋仙也。」[228]范行準認為，蘇州的種痘仙師廟與胡璞假造的峨眉山神話有關。[229]

就筆者所見，康熙初年以前，峨眉山人種痘神話尚無具體年代。至傅商霖的〈《廣布天花說》序〉始提到神痘法始於北宋時的湖廣太守。康熙年間，嘉興府平湖縣人陸琰卓在《東邨隨筆》更提到具體年代：

> 種痘之說不知起於何時，說者謂碧霞元君以宋仁宗天聖七年顯聖峨眉山，教人以佈種保赤之道，蓋或然也。[230]

陸琰卓出生較胡璞雖稍晚，但湖州與嘉興兩地相近，其所記碧霞元君顯聖峨嵋山，或可能即胡璞所言峨嵋山人故事，可惜所言未詳。而在這則記載中，創生神痘法的主角又換成碧霞元君，年代甚至是確切的宋仁宗天聖七年（1029）。

後來，故事出現了主人翁的姓名，即丞相王旦。乾隆初年，《醫宗金鑑．幼科種痘心法要旨》論及神痘法就提到：「究其所源，云自宋真宗時，峨眉山有神人出，為丞相王旦之子種痘而癒，遂傳於世。」[231]乾隆年間，方燦師從崇明痘醫施鎬，後來方氏在瀋陽將師傳種痘術編成《種痘真傳》，該書所載神話內容頗為特別，茲引如下：

> 古有種痘一法，起自宋真宗時。其年時痘大作，丞相王旦宅中上下小兒，傷於痘者甚眾，因思欲消滅此種惡疾，示於各路有司，搜索不出天痘之法，得方甚多，試之終皆自出。後四川有司呈種痘之法，言得之於山莊陳氏，陳氏得之於自降老母，老母曰：「某視汝數世良善，賜汝種痘之法，汝行是法，嘗供奉『靈母』二字，某皆默佑

228 張紫琳撰，王稼句點校，《紅蘭逸乘》（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05），卷 1，〈古迹〉，頁 269。

229 范行準，《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頁 114。

230 陸琰卓，《東邨隨筆》，頁 20a。

231 吳謙等編，《醫宗金鑑》，卷 60，〈幼科種痘心法要旨．序〉，頁 1543。

臺灣大學醫學術期刊資料庫

其無失。」忽不見。陳氏從而行之，皆效，故此莊之民，無一傷於痘者。丞相試之，果良法也，遂傳於世。[232]

施鎬、方燦所傳的這個版本，與其他版本最大差異在於未提到峨眉山，且神祇為靈母，不知為何神？從其內容看來，王素沒出現於神話中，似乎較朱純嘏《痘疹定論》所編造的神話要早一些。

在清代，峨眉山神醫傳授神痘法的神話，以朱純嘏《痘疹定論》所記最為詳細。由於筆者未曾獲見《痘疹定論》康熙末年初刊本，不敢判定最早的神話內容為何。最值得注意的是，馬伯英在《中國醫學文化史（增訂本）》中，引述乾隆三十四年（1769）沈大成序刊本《痘疹定論》，指出該版本與後續版本的故事內容短少很多。[233]另外，筆者也發現乾隆三十二年版《重刻痘疹定論》所述故事內容與乾隆三十四年版相同：

宋仁宗時，丞相王旦生子，俱苦於痘，後生子素，招集諸醫，探問方藥。時有四川人請見陳說：「峨眉山有神醫，能種痘，百不失一。……凡環峨眉山之東西南北，無不求其種痘，若有神明保護，人皆稱為神醫。所種之痘，稱為神痘。若丞相必欲與公郎種痘，某當往峨眉敦請，亦不難矣。」不逾月，神醫到京，見王素，摩其頂曰：「此子可種。」即於次日種痘。至七日發熱，後十二日，正痘已結痂矣。由是，王旦喜極而厚謝焉。神醫年近九十，乃辭厚贈，對王旦曰：「修行人要金帛何用？汝為丞相，內則贊助君德，外乃表率臣工，鎮中國而撫四邊，令天下萬民共享太平。此則我受汝之酬謝，比金帛更多焉。」遂回峨眉，傳素皈依者，告之曰：「我乃慈悲觀世音菩薩示現，指出種痘之法，欲天下之幼兒少女，咸躋壽域。吾今以此法傳授汝等，當為我廣傳，以垂久遠。」言畢，坐化而去。[234]

與傅商霖《廣布天花說》、陸琰卓《東郵隨筆》相比，《痘疹定論》所

232 方燦，《種痘真傳》（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二年〔1817〕琉璃廠漱芳齋刻本），卷上，〈種痘原始〉，頁 2b-3a。

233 馬伯英，《中國醫學文化史（增訂本）》，上冊，頁 479-480。

234 朱純嘏，《重刻痘疹定論》（清乾隆三十二年重刊本），卷 2，〈種痘論〉，頁 31a-33b。

臺灣人醫學術期刊資料庫

載故事的場景換成北宋京城開封，這或許與康熙年間在京的御醫或痘醫有關。而原在湖廣地區的金花聖母信仰，隨著神痘法傳往北京，故事內容經過重新編造，從宋仁宗時湖廣太守與三位峨眉女道士的互動，轉變為宋真宗時王旦與峨眉山神醫在開封見面，護持神痘法的神明也從金花聖母變成觀世音菩薩。

乾隆後期，《痘疹定論》的峨眉山神話幾經增添才完全定型。與前舉乾隆三十幾年這一神話版本相比，中國醫科大學圖書館所藏《痘疹定論》刻本，其神醫傳授神痘的細節鋪陳更多，且加入了上、中、下三橋女子的內容：

> 宋仁宗時，有丞相王旦，初生諸子，俱苦於痘。後老年生一子名素，招集諸幼科而告之曰：「汝等俱明於治痘否乎？求應之。」曰：「不敢言明於治痘，但略知治痘之法也。」王旦曰：「能知之，即能明之也。每年予各以十金相贈，俟小兒出痘，眾皆請來，共相認症，訂方用藥。俟結痂還元之後，再厚贈酬謝。幸毋吝教推諉。」時有四川人做京官者，聞其求醫治痘，乃請見而陳說種痘之有神醫，治痘之有妙方，十可十全，百不失一。王旦聞之喜，相問曰：「此神醫是何姓名？何處居住也？汝既知之，為我請來。」彼應之曰：「此醫非男子，乃女人也。傳說生身於江南徐州之地，自幼喫齋唸佛，長不婚嫁，亦不披剃，雲遊至四川峨眉山頂，蓋茅菴而居焉。惟時有上橋、中橋、下橋三處女子好善者，俱皆皈依，喫齋念佛。後此現身說法，自出痘症，至十二日回水結痂。乃命上中下三橋女人曰：『此痘痂可種也。……汝等依予之法，將汝自己之兒女種之，十可十全，百不失一。』遂如法種之，皆得全愈。自是環峨眉山之東西南北，無不求其種痘，若有神明保護，人皆稱為神醫。所種之痘，稱為神痘。若丞相必欲與公郎種痘，某當雇人夫肩輿，即往峨眉山，敦請此神醫，亦不難矣。」不踰兩月，敬請神醫到汴京，見王素，摩其頂曰：「此子可種。」即於次日種痘。至七日發熱，後十二日，正痘已結痂矣。由是，王旦喜極而厚謝焉。神醫年近九十，乃辭厚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贈，對王旦曰：「我修行人，要金帛何用？汝為丞相，內則贊助君德，外乃表率臣工，鎮中國而撫四邊，令天下萬民共享太平。此則我受汝之酬謝，比金帛更多焉。」由是辭回峨眉，至次年，傳三橋女人前皈依者，明白指示之曰：「我非凡胎所生，乃慈悲觀世音菩薩轉劫，指出種痘之法，欲天下之幼兒少女，咸躋壽域。吾今以此法傳授汝等，當為我廣其傳焉。」三橋女人皆俯伏，求慈悲普渡，俱稱讚神功，命我等稱何名號，以垂久遠。神醫曰：「吾乃天姥娘娘，凡種痘之家，焚香禮拜，稱揚天姥娘娘，吾即於虛空之中，大顯神通，化凶為吉。」言畢，坐化而去。[235]

乾隆四十九年（1748）致和堂重刊本，[236]與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抄本，[237]其神話內容與中國醫科大學圖書館所藏刻本並無二致。這個新版本，內容雜糅各方信仰，除了湖廣金花聖母上中下三橋的元素之外，又將前一版本的主神觀世音菩薩，與江西痘神天姥進一步結合。此後，坊間不斷重刊的《痘疹定論》，神話內容都是後面這個版本，如道光二十三年（1843）大興堂梓刻本、[238]咸豐二年（1852）趙克宜校印本，[239]內容不變。

（三）神痘法與起壇儀式

神痘法最大的特點，在於接種時必須起壇。康熙初年，林雲銘在〈種痘說〉說：「余以為結壇祀像，或出於神道設教，不必致詰，但以理揆之，有確然可信者。」[240]傅商霖在〈《廣布天花說》序〉提到，有人問種

235 朱純嘏，《痘疹定論》（《續修四庫全書》本），卷 2，〈種痘論〉，頁 32-34。

236 朱純嘏，《痘疹定論》（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致和堂重刊本微捲），卷 2，〈種痘論〉，頁 26b-29a。

237 朱純嘏，《痘疹定論》（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2），卷 2，〈種痘論〉，頁 11670-11676。

238 朱純嘏，《重訂痘疹定論》（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大興堂刻本），卷 2，〈種痘論〉，頁 26b-29b。感謝楊茜博士代查此一史料。

239 朱純嘏，《重刻痘疹定論》（清咸豐二年重刻本），卷 2，〈種痘論〉，頁 26b-29b。

240 林雲銘，《吳山縠音》，卷 5，〈種痘說〉，頁 521。

臺灣大學醫科圖書資料庫

痘何以必須立壇？他的回答是：「天下事，惟誠能通，必信為尊。既立之壇，則誠信無不感格。至于巫醫並傳解厭除邪，均于痘有益也。」[241]這點與史錫節在《痘書大全》所言類似：「其術每用符水咒誦，似于神道設教，不無異說之疑。然詳究其義，不過驅邪辟疫，實無妨于痘家。」[242]另外，方象瑛〈神痘說〉指出：

> 然則何以神名也？曰：「人情無不愛其子，然以人治，或未敢信，以神治，則爭敬奉之。所謂神道設教，蓋以愚人之耳目，不專藉結壇咒符水也。」[243]

在方氏看來，神痘法乃是一種「心理」戰術，以神之名愚人耳目，而結壇念咒僅是障眼法。洪若皐則說：「凡種痘家，務洒掃廚竈，持齋，中堂供奉天妃娘娘，朝夕誦經咒。按天妃主管江海，兼攝痘事者，雖屬神道設教，其實良法也。」[244]

關於接種神痘設神位、唸符咒等儀式，現存最早記載應為《廣布天花說．附符法》。此書所載的科儀與符咒，除了金花聖母（參見圖五）之外，涉及諸多神祇，成為神痘教醫者接種神痘的儀式範本，且為後來行醫者所取法。乾隆六年（1741），張琰在《種痘新書》也特別記載種痘的〈起壇法〉：「凡下苗後，須選吉日起壇，要備三牲，及齋儀果供各五味供奉。神聖要紅布四尺，在神位上掛彩，將紅紙一張寫神位，神位下書童男童女姓名。要擇潔淨之室以建壇。」又有〈寫神位法〉；接續又附有〈起壇總訣〉、〈解厭法〉、〈解壇法〉，並詳載祝文。[245]有學者認為：《種痘新書》記載的起壇等內容，保存了道教的種痘相關科儀，可與新發現的一些種痘祈神科儀書相參照，如嘉慶二十年（1815）抄本

241 傅商霖，《廣布天花說．附符法》，上冊，〈《廣布天花說》序〉，頁 1b-2a。感謝北京首都醫科大學章紅英教授惠賜〈《廣布天花說》序〉這一資料。

242 史錫節，《痘書大全》，卷上，〈原痘論〉，頁 3a-3b。

243 方象瑛，《健松齋集》，卷 16，〈神痘說〉，頁 259。

244 洪若皐，《南沙文集》（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本），卷 7，〈東壁園隨筆．種痘〉，頁 42b-43b。

245 張琰，《種痘新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據清乾隆刻本影印），卷 3，〈起壇法〉、〈寫神位法〉、〈起壇總訣〉、〈解厭法〉、〈解壇法〉，頁 120-125。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正一道門慶麻痘娘科》，及抄本《痘門拜娘娘誥全科》，皆有類似的內容。[246]

皇室為皇子種痘時，亦有供奉痘神及送神的儀式。[247]清代中葉，江西廣信府上饒縣醫者黃元檳精於痘科，他為人種神痘時，也在淨室中設壇。[248]江西的風俗，接種神痘有多種敬神儀式。嘉慶二十二年（1817），饒州府樂平縣縣丞劉蘭說：

> 予蒞任樂邑，忝佐民社，見樂之風俗醇謹，敬信痘神。每當初春，佈種天花，家奉香火，高設壇臺。已而，鼓吹送神，畫船雕欄，車馬、服飾、旗章之類，莫不工緻精巧，甚且俳優奏技。雖貧乏者亦殫其力之所能，以壯觀瞻誇盛事焉。[249]

吉安府亦有同樣風俗，如道光《萬安縣志》記載：湖南耒陽來的「神痘先生」，所供奉的神祇有三，一為女像，叫做「仙娘」，供以齋菜；又有一男一女，叫做「舅爺」、「舅母」，或只有一舅爺而無舅母，供以葷菜。神座前有花屏列，叫「花彩」，皆以紙篾製成。病家奉祀痘神極為虔誠，婦人每日供茶果，拜以五為規律，不敢妄發一言，唯恐犯忌諱，將不利於種痘的兒童。除此之外，聚集鄉眾吹唱，東家亦偶爾款待酒飯，叫做「鬨仙駕」。神痘所做儀式，有迎駕，有款駕，有餞駕。痘痂靨齊後，備紙轎紙馬，鼓吹送神。鄉人常常糾合一村共設神壇，所以迎送極其熱鬧。[250]永寧縣亦有此一風俗：「童男幼女種痘之時，建天姥壇輪流朝拜，供養痘師。」而且按戶出錢，紮製紙人、紙鳶、紙山、紙轎。及至痂落期滿，「撤壇開筵，乘輿跨馬，金鼓喧闐」，將先前紮的紙具，

246 姜生，〈道教與種痘術〉，頁 249-252。

247 參見胡忠良，〈乾隆十五子種痘〉，《紫禁城》1993 年第 6 期（北京），頁 42-44；〈清宮中的「阿哥種痘」〉，《中華遺產》2007 年第 5 期（北京），頁 14-15。

248 蔣繼洙、李樹藩等修纂，同治《廣信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據清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影印），卷 9，〈人物・方技〉，頁 1072。

249 董萼策、汪元祥等修纂，乾隆《樂平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 據清乾隆十七年〔1752〕刊本影印），卷 2，〈建置・壇廟〉，頁 550。

250 魏綳、張映宿修纂，道光《萬安縣志》，卷 2，〈方輿志下・風俗〉，頁 209-210。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扛的扛，背的背，一路送往他處，盡行焚燬，叫做「餞駕」。[251]晚清以來，吉安府安福縣的錢山村，則每三年請「耒陽先生」為小孩集體「放天花」，用的是點苗法，同樣有一套嚴謹的供神、送神儀式。[252]

251 謝元熙，〈寧岡舊俗改良議〉，收入丁國屏等續纂，民國《寧岡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 據民國二十六年〔1937〕鉛印本影印），卷 5，〈文徵・內編〉，頁 542。民國三年，永寧縣改為寧岡縣。

252 在放花之前數月，耒陽先生來村裏接洽，村人即進行籌備工作。首先，調查「花童」，即參加放天花的小孩，又稱「種生」。登記人數、姓名、出生年月日及父母姓名，叫「匯種生」。上屆已種花但無明顯反應者，亦必須重種。錢山村李、賀每姓花童，多者達一百二、三十人，少亦有八、九十人。接著，召集花童家長至祠堂開會，推定「香首」、「香頭」、「散班」。香首為負責人，出錢出力較多，共設四人。香頭為執行人，不限名額，抽籤決定次序，並負擔所應分攤的費用，輪值工作。散班則是做雜務的人。有了錢和人，還須在大祠堂布置娘娘壇，上供「天花聖母」神像，做為放花之所。值班香頭需在祠內住宿，叫「照壇」。在開種是日清晨二時，鳴放地銃，花童家長聞聲，即齊集娘娘壇，由頭位香首招待早點。三時左右，壇上燈燭輝煌，香煙繚繞。痘先生恭迎娘娘大駕，各家長排列在後拈香參拜。接駕後，痘先生將痘苗取出放在神案前，由地方上的郎中及有經驗的長者，挑選需要的份量，倒入磁缽內，由痘先生研成極細的粉末。這所謂的「痘苗」，係上次身體強健、出痘正常的兒童所落的痘痂，為痘先生所珍藏。接著，派人往預先約定的乳母家取人乳。乳母必須符合下列條件：第一次生產者、年青體壯者、所生嬰兒身體健強，且在半歲以下者。取來人乳，調製成痘漿，放在有蓋的磁碗內，用紅布包裹，隨即集體出發種花。痘先生在前，頭位香首捧著痘漿碗跟在旁邊，其餘各花童家長隨後，每人手執線香一根。依次先往各香首、香頭家接種，然後到其他花童家裡。痘苗係種在兒童手臂上，若是未滿月的嬰兒，則用細管吸痘苗，吹入鼻孔中。每至一家，須燃放千響爆竹迎接，參加者齊聲道賀。約莫至上午九時許，才能全部種畢。種痘後，母親對花童起居飲食悉心照顧，禁止兒童出外玩耍，不准亂吃東西。屋裏屋外，打掃乾淨。除早晚在神前上香外，並備火盆隨時焚燒芬香植物，如柏、楓、樟枝及竹葉、楓球等，富有的人家則焚燒檀香，使滿屋生香，消毒殺菌。並忌生人來家、父母同房，忌講「豆」、「麻」等字以及吵鬧叫罵和不吉利的話。數天後，花童身上生出紅點，手臂上刀口紅腫，併發高燒。此時香首會同痘先生，每天早晚至各家診視一次，稱為「落種生」。病情嚴重者，則施以藥物治療。十天後，危險期已過，花童結痘痂，精神轉好。為感謝「痘娘娘」的恩惠，須辦「娘娘宴」，每日由兩家花童家長輪流辦理，直至送娘娘而止。除備祭品供奉娘娘外，尚須宴客，有公宴、私宴之分。公宴由每家出雞一隻、肉數斤送往花壇，由祠堂公家代辦酒席一桌，請痘先生、郎中、香首及花壇辦事人員等赴宴。私宴係自辦酒席請客，至少亦要二桌以上。一個月後，兒童恢復健康，各家宴謝娘娘亦已完畢，即歡送娘娘回山。歡送是日清晨，各家長帶著花童至花壇向娘娘謝恩。各執事人

臺灣人文與醫療期刊資料庫

安徽寧國府旌德縣的洋川鎮，種痘時亦供奉痘神，而且有盛大的送娘娘儀式，紙製之神轎甚至花費銀子百兩，抬轎者必須是族中的貌美女子。[253]徽州境內民俗，種神痘亦須安神壇與還願（如演天花戲等酬神），其與種痘相關的祝禱文如〈種痘酬天后疏〉、〈種痘酬五顯神疏〉、〈出痘還願疏〉等。直至民國，婺源文書《目錄十六條》附有〈放神痘疏文〉，另文書中有〈放神痘安天花娘娘對聯〉如下：「神痘布群生枝枝清秀，天花開百樹朵朵鮮妍」，橫批為「玉潤珠圓」。[254]

蘇北百姓種痘，也起壇祀神。道光二十七年（1847）二月二十六日，江蘇通州人徐宗幹（1796-1866）請種痘師錢某為兒女及族人小兒種痘。按照當地習俗，種痘時請天后、痧痘神、「先醫」并華陀真人紙禡，設於中庭，關閉外門，內外人等不得進入，早晚焚香三次，誓不令服藥。至不得已，才求神問卜，神明都允許，才能服藥。如其子海兒因種痘煩躁，以刊行的《華真人仙方籤》問禱求藥，得六十一籤，籤內云：「紅花一錢、貝母一錢」。[255]

廣東潮州地方接種人痘，與吉安府安福縣錢山村的集體種痘一樣，必須拜祀痘神。這樣的風氣，直至民國時期依然。據縣人陳惠潮（1907-1952）談到：

> 國人素來把種痘認做一樁極神祕而隆重的事，每人一生祇接種一次。有些不開化的鄉村，每隔三數年方纔舉行一次，時間要先在神

員準備儀仗，痘先生坐在壇前，舉行送駕儀式。諸事齊備後，即整隊出發，在本村遊行一周，送至村前河邊，「借問瘟君欲何往，紙燭明船照天燒」，種花遂告圓滿結束。參見姚義興，〈錢山種花〉（2007.09.29），「安福社區」網，http://afj.cn/bbs/viewthread.php?tid=2616（2008 年 5 月 28 日檢索）。按：此文現已被刪，實在可惜！

253 孫原湘，《天真閣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據清嘉慶五年〔1800〕刻增修本影印），卷 24，〈送孃孃〉，頁 158。另參見卷 23，〈洋川竹枝辭〉，頁 149。

254 王振忠，〈徽州文書所見種痘及相關習俗〉，頁 40-41、43-44；王振忠，〈清代前期徽州民間的日常生活〉，頁 683-684；王振忠，〈徽州與衢州：江南城鄉的片斷記憶〉，頁 161。

255 徐宗幹，《斯未信齋雜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垩廬雜記〉，頁 40-4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前卜定，屆時在村裏建著神壇，鄉人恭敬祭祀後，方才挨次接種。種痘之後，家家的臥房裏都供著什麼珍珠娘娘的神位，每日要舉行種種沒意義的迷信儀式。……種痘的人，是一種祖傳的專門醫生。不當著種痘的年頭，無論鄉裏的任何人，都不能私自舉行，否則舉鄉必起而攻之。[256]

饒宗頤（1917-2018）總纂之《潮州志》亦記載：早期種痘乃是將出痘者的痘痂研末後，用筆管掬取之，吹入受種者鼻孔；繼而改用珠童（發痘兒童）的痘漿，接種至他兒的手臂。仲春氣暖，村童集團種痘，痘師帶著一位珠童，挨鄉接種，所得痘金，分潤珠童。鄉村種痘時，向設痘神珠娘神位，種痘家各備紙帛祀神求祐。過了安全期，家人取金紙，剪成金花，並準備牲禮，酬謝痘神；甚至醵資演戲，以慶其功。[257]

結　語

歷史考據與時代用語息息相關，「種痘」一詞亦然。在此之前，若干學者曾將「種痘」二字視為論證人痘接種法起源的關鍵詞，並得出嘉靖初年已有人痘接種的結論。實際上，就如許多學者所誤解的，明代「種痘」一詞主要指的是出痘、得痘、患痘或痘疫。而且，人痘接種法出現之初，主要被稱作「神丹種痘」或「神疹」、「神痘」。清初以降，「種痘」一詞才逐漸用以專指人痘接種。因此，以清代的詞語用法置諸明代，論證人痘法在嘉靖元年已經存在，在邏輯上或許有問題。

承接上面所言，人痘接種法出現時，被稱作「神丹種痘」或「神痘」，而現存史料提到神痘，可以追溯至明天啟年間湖廣衡州府的「神痘教」。從技術發展的角度看，這種技法出現的時間，或應再往前推至萬曆年間。

256 陳仰韓，〈應取締舊式種痘的醫生〉，《醫藥評論》第 56 期（1931，上海），頁 30。

257 饒宗頤總纂，《潮州志》（潮州：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2005），《風俗志》，卷 3，〈生活過程〉，頁 3429-343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清初以降，「神痘」不斷出現於資料中，且傾向於專指鼻苗法。而在晚明，湖廣已出現痘衣法，且在順治至康熙年間，湘西的黔陽、皖南的安慶及浙江的遂安、臨海等地猶可見到痘衣、痘被這種原始的技法。

神痘法，即鼻苗法，使用的疫苗為痘漿、痘痂兩類。據現存記載，痘漿法始見於崇禎年間，而痘痂法則始見於順治年間（1644-1661）。痘痂法依其記載之先後，又分為旱苗法、吹苗法與水苗法。康熙中葉的水苗法，主要施行於宮中，民間較為少見。康熙末年，《痘疹定論》將人痘法歸結為四種：天姥種法（水苗法）、吹鼻法、痘衣法、痘漿法。乾隆初年，《醫宗金鑑》則歸結為水苗種法、旱苗種法（吹鼻法）、痘衣種法和痘漿種法。但這四種方法，都漏了痘痂法的最初型式，即將痘痂研成粉末，以棉花包裹，塞入鼻孔的旱苗法。而水苗法僅多了一道程序，是將痘痂粉末調水或乳，再以棉花包裹，塞入鼻孔。嘉道之際，湖南又出現手臂點苗法。而中國種痘法的發展進程，應該是痘衣（或痘被）法→痘漿鼻苗法→痘痂鼻苗法（旱苗法→吹苗法→水苗法）→手臂點苗法。在乾隆以後，雖然《醫宗金鑑》強烈推薦水苗法，且力阻痘漿法、痘衣法，但採用水苗法者甚為少見，最普遍的則是吹苗法，甚至痘漿法與痘衣法、痘被法還在下層百姓間流傳。民間的人痘接種，並未因太醫的呼籲而「標準化」。

神痘法作為一種神奇的醫術，其傳播與神痘信仰相表裏。早在天啟年間，神痘法已借助「神痘教」以傳播，而神痘教這一信仰所供奉的女神金花聖母，在後續的傳播過程中仍然如影隨行，除信仰圈擴張至湖北、江西、陝西、安徽等地之外，峨眉山神人創造神痘法的神話，其最早的原型也是金花聖母信仰，後來才有碧霞元君、觀世音菩薩、天姥等傳授神痘法諸說。而且，天花金花聖母上中下三位娘娘之說，在清代的醫書、日用類書、神話中均有直接記載，地方志、筆記中雖僅言及掌痘三女神，卻可以對應前面的證據。從職業神的角度看，天花金花聖母乃是擁有神痘技法者的守護神，在其信仰散布於湘、鄂、贛、皖、浙及秦陝等地的過程中，天花金花聖母與神痘法兩者是相互為用。而為了崇祀神痘教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位女神，各地甚至出現不少廟宇。

至於糾纏學界超過百年的峨眉山神人傳授神痘法之說，現今雖被大部分學者拋棄，但從中卻可以觀察神痘法傳播的軌跡。綜合以上各種記載，在金花天（聖）母之後，起源神話眾說紛紜，因地而異。其實，對各地神痘醫師來說，這可能並不重要。原因在於：這種新生的技術，一開始即面對幼科醫家的抵制與抗拒，神痘接種師為引誘與說服民眾前來施種，必須援引各地主要痘神「神道設教」的支持，因此神話內容必須「因地制宜」和「入境隨俗」，這樣才能讓當地痘神配合在地醫者，共同來推展神痘法。要之，晚明出現於湖南的神痘法，在其後續的發展過程中，搭配各地痘神而開疆擴土，神明可以是金花聖母、天姥，也可以是碧霞元君、觀世音菩薩、天妃（天后）媽祖，當然也可以是種痘仙師。至於神痘法出現的時間，並非充要條件，可以是唐代、宋代或明代。但不論如何，接種神痘時，起壇祀神最為關鍵，即使在宮中也是如此。而在皖南、江西，接種神痘還成為一個有序且組織化的敬神活動。

就這樣，神痘師、神痘法、神痘教三位一體，開創了三百多年的天花預防史。直到民國，神痘的稱呼還縈繞在湖南百姓的腦海中。最為有趣的是，衡山等地猶存在神痘師設娘娘廟的舊習。民國二十年（1931）五月，中國國民黨湖南省黨務指導委員會常務委員何鍵、張炯函請湖南省政府查禁神苗、提倡牛痘，公文內提到：

> 查神苗一名辰痘，又名大苗，又謂之鋪香，在中國境內流傳千有餘年。……業神苗者於衡山、寶慶各地設有娘娘廟，又稱痘苗局，春夏以人度苗，秋冬攜苗廣播各縣。其種散布空中，最易傳染，人感而死者，無處無之。……遂擬定革除神苗辦法於次：一、請轉省府查將衡山、寶慶各地之娘娘廟（神痘苗局）應盡撤銷。二、業神苗之醫生，一律改習點種牛痘方法。三、張貼廢除神痘及究辦業神痘者，及應點牛痘標語。四、省府出示布告，俾眾咸知應即廢除（神）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普種牛痘。如有醫生仍點神痘者，准各當地人民綑送政府究辦。[258]

這段記載再次印證天啟年間的那幕神痘教敘述，信神痘教者蓋娘娘廟，一直是一個傳統。民國二十二年（1933），長沙縣政府下令嚴禁神苗痘醫，但這年的歲末，伏龍、新康、九峯、明道一帶，「忽來神苗痘生，強用舊法點種，團保多不制止，反從而維護之」。[259]迄至二十世紀中後期，隨著國家機器的強力介入，才逐退神痘法、神痘師與神痘教。

*本文撰寫過程中，承蒙孫承晟、安介生、章紅英、余新忠等教授與楊茜、李根利、盧守曄、余輝諸學棣惠予協助，王振忠、常建華等教授及兩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謹於此頓首拜謝！

（責任編輯：石昇烜　吳昌峻　校對：李　頎　黃方碩　詹前倬）

258 何鍵、張炯，〈函湖南省政府〉（民國二十年五月二十日），《湖南黨務月刊》第 3 期（1931，長沙），頁 69-70。

259 〈縣政府令各區嚴厲制止神苗痘醫〉，《長沙民報》第 41 期（1933，長沙），頁 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文獻史料

于慎行，《穀城山館文集》。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 據明萬曆于緯刻本影印。
白雲觀長春真人編纂，正統《道藏》。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據明正統十年（1445）刻本影印。
朱國楨，《朱文肅公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據清抄本影印。
何喬遠，《何氏萬曆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據明萬曆四十年（1612）刻本影印。
邵經邦，《弘藝錄》。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 據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邵遠平刻本影印。
邵經濟，《西浙泉厓邵先生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據藏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張景賢王詢等刻本影印。
查　鐸，《穀齋查先生闡道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據清光緒十六年（1890）涇川查氏濟陽家塾刻本影印。
茅元儀，《石民四十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據明崇禎刻本影印。
徐　媛，《絡緯吟》。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據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范氏刊本影印。
陳嘉謨，《本草蒙筌》。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
鄭仲夔，《冷賞》。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 據清道光蔡氏紫梨華館重雕本影印。
張自烈撰，廖文英續，《正字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據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畏堂刻本影印。
湯賓尹，《睡庵稿・詩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據明萬曆刻本影印。
溫體仁等撰，《明熹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萬　全，《痘疹世醫心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據明萬曆十一年（1583）陳允升刻本影印。
萬　全，《痘疹格致要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據明嘉靖間羅田萬氏原刊本。
允肅氏，《種痘書》。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圖書館藏清抄本微捲。
方　燦，《種痘真傳》。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二年（1817）琉璃廠漱芳齋刻本。
方以智，《物理小識》。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據清康熙年間宛平方氏刊本。
方象瑛，《健松齋集》。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 據清康熙世美堂刻康熙四十年（1701）續刻本影印。
毛聚奎，《吞月子集》。臺北：中國文化研究所，1964 據民國二十三年（1934）四明張氏約園刊本影印。
王　扞，《王巢松年譜》。上海：上海書店，1994 據吳中文獻小叢書影印。
王　珠，《種痘心法要旨集註》。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刻本。
王崇炳，《金華徵獻略》。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 據清雍正金律刻本影印。

臺灣大學醫學圖書館典藏

王應奎撰，王彬、嚴英俊點校，《柳南隨筆》。北京：中華書局，1983。
史錫節，《痘書大全》。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尺木堂刻本。
合信氏、管茂材同撰，《婦嬰新說》。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據清咸豐八年（1858）刻本影印。
朱純嘏，《痘疹定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據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刻本影印。
朱純嘏，《痘疹定論》。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致和堂重刊本微捲。
朱純嘏，《重刻痘疹定論》。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重刊本。
朱純嘏，《重訂痘疹定論》。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大興堂刻本。
朱純嘏，《重刻痘疹定論》。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清咸豐二年（1852）重刻本。
朱純嘏，《痘疹定論》。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2 據清抄本影印。
朱慶萼、黃大承等修纂，同治《新昌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 據清同治十一年（1872）刊本影印。
佚　名，《宴謝痘瘢娘娘行科》，收入李崇仰編，《中國符咒百科全書》第 1 輯。臺北：集文書局，1999。
吳　瑭，《問心堂溫病條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據清嘉慶十八年（1813）問心堂刻本影印。
吳　謙等編，《醫宗金鑑》。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3。
李　清，《李映碧公餘錄》。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 據明崇禎刻本影印。
李　琬、齊召南修纂，乾隆《溫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據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刊民國三年（1914）補刻本影印。
李　瑾、葉長揚等修纂，乾隆《旌德縣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據清乾隆十九年（1754）刻本影印。
李　驎，《虬峯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據清康熙刻本影印。
李向榮等修纂，《三田李氏重修宗譜》。北京：線裝書局，2002 據清乾隆間刻本影印。
李兆洛，《養一齋文集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據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增修本影印。
來集之輯，《倘湖樵書．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據清康熙倘湖小築刻本影印。
周紹濂、蔡榜等修纂，嘉慶《德清縣續志》。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嘉慶十三年（1808）原刊、民國十年（1921）修志事務所石印本。
林雲銘，《吳山彀音》。濟南：齊魯書社，2002 據清康熙刻本影印。
俞　樾撰，貞凡等點校，《茶香室叢鈔》。北京：中華書局，1995。
冒　襄，《巢民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據清康熙刻本影印。
洪　蕙纂，嘉慶《延安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據清光緒十年（1884）補刊本影印。
洪若皐，《南沙文集》。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廿七年（1688）友益齋刻本。
洪若皐，《南沙文集》。北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廿七年（1688）刻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洪若皐，《南沙文集》。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 據清康熙刻本影印。
胡具慶，《甲初日記》。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
范之煥、陳啓禧等修纂，康熙《湖口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 據清康熙十二年（1673）刊本影印。
孫原湘，《天真閣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據清嘉慶五年（1800）刻增修本影印。
徐宗幹，《斯未信齋雜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徐無忝抄，蔣良臣刪節，《種痘仙方》。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刊本。
郝玉麟、謝道承等修纂，雍正《福建通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張　琰，《種痘新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據清乾隆刻本影印。
張　璐，《張氏醫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據清康熙寶翰樓刻本影印。
張在田、游鳳藻等修纂，嘉慶《龍陽縣志》。北京：中國書店，1992 據清嘉慶十九年（1814）刻本影印。
張扶翼，《望山堂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光緒十二年（1886）重刊本。
張紫琳撰，王稼句點校，《紅蘭逸乘》。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05。
曹　煜，《繡虎軒尺牘》。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據清康熙傳萬堂刻本影印。
曹　煜，《繡虎軒尺牘二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據清康熙傳萬堂刻本影印。
曹秉仁、萬經修纂，雍正《寧波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據清乾隆六年（1741）補刊本影印。
曹鼎新、龍升修纂，康熙《瀏陽縣志》。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九年（1680）刊本微捲。
梁紹壬著，莊葳標點，《兩般秋雨盦隨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章學誠，《湖北通志檢存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據民國十一年（1922）劉氏嘉業堂刻《章氏遺書》本影印。
莊泰弘等纂修，康熙《寧國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 據康熙十二年（1673）重修刊本影印。
許　起，《珊瑚舌雕談初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據清光緒十一年（1885）木活字印本影印。
許豫和，《橡村痘訣》。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刊本。
許應鑅、曾作舟等修纂，同治《南昌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 據清同治十二年（1873）刊本影印。
郭　燦、黃天策等修纂，乾隆《瑞金縣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據清乾隆十八年（1753）刻本影印。
陳　鼎，《滇黔土司婚禮記》。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據《知不足齋叢書》本排印。
陳東嶺，《種痘奇書》。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圖書館藏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刊本微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陳復正輯訂，黃政德整理，《幼幼集成》。海口：海南國際出版中心，1996。
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臺北：鼎文書局，1976。
陳夢雷編，李鴻濤等標點，《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8-1991。
陳樹芝纂修，雍正《揭陽縣志》。北京：中國書店，1992 據清雍正九年（1731）刻本影印。
陶 耀修纂，康熙《弋陽縣志》。杭州：華寶齋書社，2001。
陸琰卓，《東邨隨筆》。上海：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傅商霖，《廣布天花說・附符法》。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十八年（1679）抄本。
喻 昌著，蔣力生點校，《寓意草》。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曾王孫，《清風堂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據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曾安世刻本影印。
程岱荄，《野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據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廛隱廬增修本影印。
程雲鵬，《慈幼新書》。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89。
費啓泰，《救偏瑣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據清嘉慶元年（1796）金閶惟善堂印本影印。
黃虞再、閔鈳修纂，順治《奉新縣志》。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元年（1662）刻本。
董 含，《三岡識略》。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
董 含，《蓴鄉贅筆》。臺北：廣文書局，1980。
董 含著，致之標點，《三岡識略》。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
董萼策、汪元祥等修纂，乾隆《樂平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 據清乾隆十七年（1752）刊本影印。
董維嶽原撰，董上貴校補，《痘疹專門》。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清光緒七年（1881）重刊本。
熊文舉，《雪堂先生文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據清初刻本影印。
齊德五、黃楷盛等修纂，同治《湘鄉縣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據清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影印。
劉本沛，《虞書》。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 據民國二十一年（1932）鉛印本影印。
樂 鈞著，石繼昌校點，《耳食錄》。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87。
蔣繼洙、李樹藩等修纂，同治《廣信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據清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影印。
鄭 珍，《巢經巢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據民國三年（1914）花近樓刻《遵義鄭徵君遺著》本影印。
鄭克壇，《彤園醫書・小兒科》。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
應先烈、陳楷禮等修纂，嘉慶《常德府志》。長沙：嶽麓書社，2008 據清嘉慶十八年（1813）刻本影印。
魏 綳、張映宿修纂，道光《萬安縣志》。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譚　瑄等修纂，康熙《弋陽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 據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刊本影印。

〈訓令各屬嚴禁吹花惡習提倡新法種痘以保嬰孩健康由〉，《雲南民政月刊》第 14 期，1935，昆明，頁 49-50。

〈縣政府令各區嚴厲制止神苗痘醫〉，《長沙民報》第 41 期，1933，長沙，頁 5。

丁國屏等續纂，民國《寧岡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 據民國二十六年（1937）鉛印本影印。

王尹西，〈訓令各縣縣長據餘干縣種痘局長楊祖堯等呈報有素行舊法種痘之龍元奇等流竄餘干等縣佈種天花仰即嚴禁由（社字第五〇四號）〉，《江西民政公報》第 62 期，1930，南昌，頁 57。

朱峙三著，章開沅選輯，《朱峙三日記》，收入《辛亥革命史叢刊》第 10 輯。北京：中華書局，1999。

朱峙三著，胡香生輯錄，《朱峙三日記》。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何　鍵、張炯，〈函湖南省政府〉（民國二十年五月二十日），《湖南黨務月刊》第 3 期，1931，長沙，頁 69-70。

崔公甫、高熙喆修纂，民國《續滕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據民國三十年（1941）刻本影印。

蕭家修、歐陽紹祁等修纂，民國《分宜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 據民國二十九年（1940）石印本影印。

簡朝亮編，《粵東簡氏大同譜》。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 據民國十七年（1928）鉛印本影印。

饒宗頤總纂，《潮州志》。潮州：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2005。

杜赫德編，朱靜等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III）》。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

Ball, J. Dyer. *Things Chinese*. Hong Kong: Kelly & Walsh, 1903.

Barrow, John. *Travels in China, Pekin to Canton*. London: T. Cadell and W. Davies in the Strand, 1804.

Das, Sarat Chandra. *Journey to Lhasa and Central Tibet*. London: John Murray, 1902.

Downing, Charles Toogood. *The Fan-Qui in China, in 1836-7*, vol. 2. London: Henry Colburn, 1838.

Holwell, John Zephaniah. *An Account of Manner of Inoculating in the East Indies*. London: Printed for T. Becket, and P. A. De Hondt, 1767.

La Condamine, Charles-Marie de. *The History, of Inoculation*. New Haven: Printed for T. and S. Green, 1773.

Lockhart, William.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of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London: Hurst and Blackett, Publishers, 186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Moore, James. *The History of the Smallpox*. London: Longman, Hurst, Rees, Orme, and Brown, Paternoster-Row, 1815.

Rennie, David Field. *Peking and the Pekingese during the First Year of the British Embassy at Peking*, vol. 2. London: John Murray, 1865. 中譯本：李紹明譯，《北京與北京人》。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

Staunton, George Leonard.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vol. 2. London: W. Bulmer and Co., 1797.

Williams, Samuel Wells. *The Middle Kingdom: A Survey of the Geography, Government, Literature, Social life, Arts, and History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d its Inhabitants*, vol. 2. London: W. H. Allen & Co., 1883.

Wise, Thomas.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2. London: J. Churchill Ltd., 1867.

二、近人研究

平，〈種痘是中國發明〉，《生路》革新第 9 期，1937，無錫，頁 8-9。

上海中醫學院等編寫，《中國醫學史》。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78。

于景枚，〈痘瘡源流〉，《中華醫學雜誌》第 27 卷第 11 期，1942，上海，頁 697-698。

山西中醫研究所教研組編，《中國醫學史略》。太原：山西中醫研究所教研組，1974。

中國中醫研究院中醫教材編輯委員會編輯，《中國醫學史》。北京：中醫研究院中醫教材編輯委員會，1956。

中國中醫研究院、廣州中醫學院主編，《簡明中醫辭典》。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79。

中國中醫研究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主編，《中醫人物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8。

孔建民，《中國醫學史綱》。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9。

王吉民，〈中國歷代醫學之發明（續）・第四章〉，《中華醫學雜誌》第 13 卷第 5 期，1927，上海，頁 315-332。

王吉民，《中國歷代醫學之發明》。上海：新中醫社，1930。

王振忠，〈徽州文書所見種痘及相關習俗〉，《民俗研究》2000 年第 1 期，濟南，頁 37-68。

王振忠，〈《朱峙三日記》所見晚清武昌縣民俗及其變遷〉，《民俗研究》2001 年第 1 期，濟南，頁 114-126。

王振忠，〈清代徽州民間的災害、信仰與相關習俗——以婺源縣浙源鄉孝悌里鳳騰村文書《應酬便覽》為中心〉，《清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北京，頁 105-119。

王振忠，〈清代前期徽州民間的日常生活——以婺源日用類書《目錄十六條》為例〉，收入陳鋒主編，《明清以來長江流域社會發展史論》，頁 675-726。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

王振忠，〈徽州與衢州：江南城鄉的片斷記憶——稿本《靜寄軒見聞隨筆、靜寄軒雜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初探〉，《社會科學》2011 年第 3 期，北京，頁 153-162。
王祖德，〈天花、舊法種痘、牛痘三者之症象與比較〉，《天津特別市衛生局月刊》第 1 卷第 3 期，1929，天津，頁 17-18。
王嘉斌，〈清代天花防治研究〉。臺北：東吳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王曉鶴主編，《中國醫學史》。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
王樹岐、李經緯、鄭金生合著，《古老的中國醫學——中國醫學編年史研究》。臺北：緯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0。
北京中醫學院醫史教研組編，《中國醫學史講義》。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0。
北京中醫學院醫史教研組編，《中國醫學史中級講義》。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2。
史仲序，《中國醫學史》。臺北：國立編譯館，1984。
任道斌，《方以智年譜》。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
任應秋編著，《中國醫學史略》。重慶：重慶市中醫進修學校，1955。
朱寶忠，〈人痘接種史話〉，《中西醫結合雜誌》第 2 卷第 4 期，1982，北京，頁 247-248。
余新忠，〈清代江南種痘事業探論〉，《清史研究》2003 年第 2 期，北京，頁 28-37。
吳少禎、曾令真編，《中國兒科醫學史》。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1990。
宋子筠，〈發明天花牛痘的原因並破除謝花的迷信〉，《敝帚千金》第 23 期，1907，天津，頁 7a-8b。
李克蕙，〈種痘法沿革說略〉，《國醫砥柱月刊》第 3 期，1937，北平，頁 30-31。
李經緯，《中醫史（修訂本）》。海口：海南出版社，2015。
李經緯、李志東，《中國古代醫學史略》。石家莊：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
李經緯、林昭庚主編，《中國醫學通史・古代卷》。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0。
李健頤，〈種痘術是中國最初之發明〉，《衛生報》第 25 期，1928，上海，頁 199。
杜家驥，〈清代天花病之流傳、防治及其對皇族人口之影響初探〉，收入李中清、郭松義編，《清代皇族人口行為和社會環境》，頁 154-169。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
杜家驥，〈從清宮醫案看天花的防治——種痘與治痘〉，收入常建華主編，《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 8 卷，頁 59-69。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
沙書文，〈種痘攷略〉，《中醫世界季刊》第 6 卷第 1 期，1933，上海，頁 46-47。
周仲衡，〈中國種痘考〉，《中華醫學雜誌》第 4 卷第 1 期，1918，上海，頁 6-10。
周建新，《江西客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邱仲麟，〈明清的人痘法——地域流佈、知識傳播與疫苗生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7 本第 3 分，2006 年 9 月，臺北，頁 460-501。
邱仲麟，〈明清的痘疫與痘神廟〉，「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m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in Urban China from the Ming to the Republic」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北京：法國遠東學院與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合辦，2009 年 10 月 29-31 日。
邱仲麟，〈明代以降的痘神廟與痘神信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88 本第 4 分，2017 年 12 月，臺北，頁 785-9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侯甲峯，〈友雲樓筆記・種痘〉，《三六九畫報》第 15 卷第 11 期，1942，北平，頁 19。
俞慎初，《中國醫學簡史》。福州：福建省中醫藥學術研究委員會，1956。
俞慎初，《中國醫學簡史》。福州：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1982。
哈爾濱醫科大學祖國醫學教研組編，《中國醫學史》。哈爾濱：哈爾濱醫科大學，1974。
姚元翼主編，《中國醫學史》。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2。
姚靄園，〈種痘的起源〉，《民眾醫藥彙刊》第 2 卷，1935，上海，頁 172。
姜　生，〈道教與種痘術〉，「『宗教與醫療』學術研討會暨亞洲醫學史學會第二次年會」論文。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2004 年 11 月 16-19 日。
姜　生，〈1522 年中國種痘的最早記載及傳說考論〉，《自然科學史研究》第 27 卷第 1 期，2008，北京，頁 123-130。
姜　生，〈道教與種痘術〉，收入林富士主編，《宗教與醫療》，頁 205-262。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
姜振勛，〈種痘叢談〉，《新醫與社會彙刊》第 1 集，1928，上海，頁 373-375。
姜振勛，〈三種預防天花之方法〉，《新醫與社會彙刊》第 2 集，1934，上海，頁 143-146。
洪波編著，《中國醫學世界之最》。北京：中國旅游出版社，1991。
胡忠良，〈乾隆十五子種痘〉，《紫禁城》1993 年第 6 期，北京，頁 42-44。
胡忠良，〈清宮中的「阿哥種痘」〉，《中華遺產》2007 年第 5 期，北京，頁 14-15。
苗潤博，〈起源時間與傳說流變：種痘術早期發展史二題〉，《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 17 卷下，2016，天津，頁 163-169。
范行準，《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上海：華東醫務生活社，1953。
范行準，《中國醫學史略》。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後勤學院，1961。
范行準，《中國醫學史略（增訂版）》。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86。
祝振綱、咎希昭，《說痘》。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
陝西中醫學院主編，《中國醫學史》。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
馬伯英，《中國醫學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馬伯英，《中國醫學文化史（增訂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高鏡朗，《古代兒科疾病新編》。上海：上海衛生出版社，1956。
張嗣介，〈贛州仙娘古廟與太太生日〉，收入羅勇、林曉平主編，《贛南廟會與民俗》，頁 114-141。香港：國際客家學會等，1998。
張嘉鳳，〈清康熙皇帝採用人痘法的時間與原因試探〉，《中華醫史雜誌》第 26 卷第 1 期，1996 年 1 月，北京，頁 30-32。
曹良海主編，《贛南客家古村白鷺》。北京：方志出版社，2004。
梁其姿，〈明清預防天花措施之演變〉，收入陶希聖先生九秩榮慶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國史釋論：陶希聖先生九秩榮慶祝壽論文集》上冊，頁 239-253。臺北：食貨出版社，1987。
盛國榮，〈我所見到中醫書裏所記載的濾過性病毒的疾病〉，《上海中醫藥什誌》1956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5 月號，上海，頁 40-44。
陳　垣，〈牛痘入中國考略〉，《醫藥衛生報》第 7 期（1909，廣州），後收入《陳垣早年文集》，頁 217-224。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2。
陳世綱，〈種痘新書〉，《現代醫藥雜誌》第 4 卷第 37/38 期，1949，貴陽，頁 2-8。
陳仰韓，〈應取締舊式種痘的醫生〉，《醫藥評論》第 56 期，1931，上海，頁 30-31。
陳存仁，〈中國醫學上的偉大發明〉，《大成》第 14 期，1975，香港，頁 2-6。
陳汝檢，〈論種痘〉，《博濟月報》第 26 期，1921，廣州，頁 3-11。
陳邦賢，《中國醫學史》。上海：上海醫書局，1919。
陳邦賢，《中國醫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陳邦賢，《中國醫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
陳勝崑，《中國全集（4）：科技中國》。臺北：錦繡出版社，1982。
張一鳴，〈人痘接種法的文獻研究〉。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碩士論文，2016。
傅維康等合著，〈人工免疫法的先驅——人痘接種術〉，收入傅維康等著，《醫藥史話》，頁 194-202。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2。
傅維康，《中國醫學史》。上海：上海中醫學院出版社，1990。
惲鐵樵，《上海鐵樵函授中醫學校講義》第 10 種《幼科講義》第 2 期，1911，上海，頁 1-15。
曾　材，〈寧都城廂的寺廟與廟會〉，收入劉勁峯主編，《寧都縣的宗族、廟會與經濟》，頁 265-288。香港：國際客家學會等，2002。
湯學良，〈江希舜簡考〉，《中華醫史雜誌》第 17 卷第 2 期，1987，北京，頁 90。
楊九徵，〈種痘術〉，《楚寶雜誌》第 1 卷第 1 期，1917，北京，頁 1-7。
楊義騰，〈《正字通》成書探考〉，《中國文化大學中文學報》第 23 期，2011 年 10 月，臺北，頁 87-108。
萬伯英，〈天花（痘）瑣語〉，《廣濟醫報》第 6 卷第 5 期，1921，杭州，頁 38-42。
賈得道，《中國醫學史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
廖育群，《歧黃醫道》。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
趙璞珊，《中國古代醫學》。北京：中華書局，1983。
蔡　策，《客家民俗——談贛南》。臺北：老古文化事業公司，1997。
蔡景峰編，《中國醫學史上的世界記錄》。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83。
蔣似柏，〈種痘沿革考〉，《生命與健康》第 3 卷第 3 號，1929，上海，頁 3-6。
劉伯驥，《中國醫學史》。臺北：華岡出版部，1974。
鄭曼青、林品石，《中國醫藥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
遼寧中醫學院編，《中國醫學史講義》。瀋陽：遼寧中醫學院，1958。
鍾俊昆，〈江西客家仙娘廟會調查〉，《尋根》2010 年第 4 期，鄭州，頁 76-81。
韓　琦，《中國科學技術的西傳及其影響（1582-1793）》。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鐘　鋒、姚麗群、耿海生，〈《種痘小引》對人痘接種術的記述〉，《中華醫史雜誌》第 39 卷第 3 期，2009 年 5 月，北京，頁 13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顧學箕，〈種痘叢談〉，《民眾醫藥彙刊》第 1 卷，1934，上海，頁 269-271。

韓德森（D. A. Henderson）著，林基興譯，《天花之死：根除全球殺手的內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1。

李約瑟講，陳養正譯，〈中國與免疫學的起源〉，收入潘吉星主編，《李約瑟文集》，頁 1019-1035。瀋陽：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1986。

李約瑟講，馬伯英、林群譯，〈中國與免疫學的起源（續）〉，《中醫藥學報》1983 年第 5 期，哈爾濱，頁 8-14。

古屋昭弘，〈張自烈と『字彙辯』——『正字通』の成書過程〉，《東洋學報》第 74 卷第 3/4 期，1993，東京，頁 97-124。

古屋昭弘，〈張自烈『增補字彙』について〉，《中國文學研究》第 19 期，1993，東京，頁 97-108。

Alphen, Jan Val, and Anthony Aris, eds. *Oriental Medicine: An Illustrated Guide to the Asian Arts of Healing*. London: Serindia Publications, 1995.

Boylston, Arthur. “The Origins of Inoculation.” *Journal of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 105 (July 2012, London), pp. 309-313.

Cantlie, James. “Inoculation and Vaccination for Smallpox amongst the Chinese.”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1501 (1899, London), pp. 761-762.

Castiglioni, Arturo. *A History of Medicin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47.

Dixon, C. W. *Smallpox*. London: J. & A. Churchill Ltd., 1962.

Dudgeon, John.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Peking for the Half-year ended 31st March 1871.” *Customs Gazette* no. 10, part 6 (1871, Shanghai) , pp. 6-9.

Fenner, F., D. A. Henderson, I. Arita, Z. Jezek, and I. D. Ladnyi. *Smallpox and its Eradication*.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88.

Forshaw, Charles F. “The History of Inoculation.”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2592 (September 1910, London), pp. 633-634.

Guthrie, Douglas. *A History of Medicine*. London: Thomas Nelson And Sons Ltd., 1945.

Heinrich, Larissa N. *The Afterlife of Images: Translating the Pathological Bod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

Hopkins, Donald R. *Princes and Peasants: Smallpox in Hist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Klebs, Arnold Carl. “The Historic Evolution of Variolation.” *The Johns Hopkins Hospital Bulletin* 24, no. 265 (March 1913, Baltimore), pp. 70-83.

Lahariya, Chandrakant. “A Brief History of Vaccines & Vaccination in India.” *Indian Journal of Medical Research* 139 (April 2014, Gwalior), pp. 491-511.

Macgowan, John.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Wenchow for the Half-year ended 31st March 1884.” *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Medical Reports* 27 (1884, Shanghai), pp. 9-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Miller, Genevieve. *The Adoption of Inoculation for Smallpox in England and Franc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57.

n/a. “Inoculation in China.”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614 (1872, London), p. 391.

n/a. “Small-pox Inoculation.”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1847 (1896, London), pp. 1264-1265.

Needham, Joseph. *China and the Origins of Immunology*. Hong Kong: Center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0.

Needham, Joseph.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6, *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 part 6: *Medic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arker, E. H. “Smallpox and Inoculation in China.”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2402 (1907, London), pp. 88-90.

Peter, William Wesley. *The Heavenly Flower: Smallpox*. Shanghai: The American Red Cross, 1920s.

Somerville, J. R.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Foochow for the Half-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77.” *Chinese Imperial Customs Medical Reports* 14 (1877, Shanghai), pp. 83-91.

Stearns, Raymond Phineas, and George Pasti Jr. “Remark upon the introduction of Inoculation for Smallpox in England.”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24, no. 2 (1950, Baltimore), pp. 103-122.

Temple, Robert. *The Genius Of China: 3,000 Years of Science, Discovery, and Inventio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6.

Thomson, J. C. “The Heavenly Flowers.”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1, no. 4 (1887, Shanghai), pp. 157-161.

Wain, Harry. *A History of Preventive Medicine*. Springfield, Illinois: Charles C. Thomas Publisher, 1970.

Wellcome, Henry S. (foreword). *The History of Inoculation and Vaccination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Disease*. London: Burroughs Wellcome & Co., 1913.

Wong, K. Chimin. “Smallpox in China.” *National Medical Journal of China* 4, no. 4 (1918, Shanghai), pp. 94-97.

Wong. K. Chimin. “China’s Contribution to the Science of Medicine.”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43, no. 12 (1929, Shanghai), pp. 1193-1208.

Wong, K. Chimin and Wu Lien-Teh.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 1936.

三、網路資料

姚義興，〈錢山種花〉，「安福社區」網，http://afj.cn/bbs/viewthread.php?tid=2616（2008年5月28日檢索）。

神田玄泉《痘疹精要》痘圖（1720），https://www.tumblr.com/search/kanda%20gensen（20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年 3 月 1 日檢索）。
耶蘇會士韓國英從北京寄回巴黎的兒童出痘圖，http://www.wikigallery.org/wiki/painting_171867/Anonymous-Artist/Child-with-smallpox-%282%29（2018 年 12 月 24 日檢索）。
耶蘇會士韓國英從北京寄回巴黎的兒童出痘圖，https://www.alamy.com/stock-photo-medicine-disease-smallpox-little-girl-with-smallpox-and-a-coral-piece-110821495.html（2018 年 12 月 24 日檢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istorical Inquiry 64 (Dec. 2019), pp. 125-204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OI: 10.6253/ntuhistory.201912_(64).0004

Rethinking the Origin of Variolation and Its Spread in Ming-Qing China

Chiu, Chung-lin*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address three issues related to variolation. First, the term “zhong dou” referred to a contraction or an epidemic of smallpox in the Ming dynasty, rather than variolation. The term “zhong dou” did not take on the meaning of variolation until the Qing dynasty. Therefore, it would be a mistake to take the words too literally and to interpret “zhong dou” in Ming-Dynasty literature with a Qing dynasty connotation.

Second, when variolation first appeared, it was dubbed “shen dou,” meaning “variolation with gods’ medicine” or “variolation method taught by gods.” Description of the medical technology first appeared in historical document in 1625 or 1626 in Hengzhoufu of the Huguang province. The gods’ variolation method spread to Jiangxi in 1626, to Anhui and the Jiangnan areas during the Chongzhen era (1627-1644). It spread to an even wider region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and the term “shen dou” was widely used. Legend has it that “shen dou” originated in Sichuan; however, no record in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Qing dynasty indicate that the legend was true.

Third,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shen dou” religion appeared in

*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No.130, Sec. 2, Academia Rd., Nangang Dist., Taipei City 11529, Taiwan (R.O.C.);
E-mail: cjlccy@asihp.net.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engzhoufu, which worshipped the “jin hua sheng mu (golden flower goddess).” The goddess was said to have accompanied many doctors to teach the variolation method in faraway places. “Jin hua sheng mu” was actually three goddesses and had appeared in Hubei, Jiangxi, Anhui, and Shaanxi. The legend of a miracle-working doctor in Mount Emei, who taught “shen dou”, originated from the legend of “jin hua sheng mu.” In conclusion, the term “zhong dou” is not the best key word in researching the subject. Instead, terms such as “shen dou” and “jin hua sheng mu” are the ultimate code for probing the origin of smallpox variolation.

Keywords: zhong dou (smallpox contraction), shen dou (gods’ variolation), Hunan, jin hua sheng mu (golden flower goddess), Mount Emei.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